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324 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目 录

【语言教育研究专辑】

【论 文】

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

——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

常 安

流动视域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王浩宇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

——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焦开山、郭靓雯

【学生课程作业】

语文课本如何建构民族意识？——对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王朗宁

民族建构、现代化与泰国南部穆斯林教育的变迁

宋文思

浅析新加坡语境中的“华人特权”

梁诗慧

【网络文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中华民族认同

邓立光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1922



【论 文】

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 ——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¹

常 安²

提要：语言文字的多维属性，决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重要的宪制意蕴。从权利保护视角出发，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工作的权利、文化权利、经济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真正保障和长远利益考虑。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心理基础之夯实，是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法治统一的必然要求。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公民权利保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国之大计。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权利保障；国家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基于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有机联系、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言文字需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汉语言文字在国家语言文字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说，“汉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其加以推广普及，是历代中央政权的一项治国方略”^[1]。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并于1956年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普通话的大潮。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分别在其总则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现行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于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法律地位的明确，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公民受教育权、劳动权、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保护的制度保障需求所在，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自身巩固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国家语言文字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必然要求。

教育，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所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少数民族公民的权利享有与个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于更好地就业、更好地接受现代文化、更便捷地融入现代社会都有利。要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 (P.268)}。教育部、国家语委2016年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基本普及，语言障碍基本消除；农村普通话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并且强调要“提高保障国家战略和安全的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加强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研究，为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

¹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10页。

²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宪法学、政治学。

社会稳定提供政策支持和专业服务”^[3]。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被赋予语言扶贫的重要政治使命，关系到民族地区、游牧地区、“直过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实现的论述中，多次提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教育。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4]。因此，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系到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个人发展空间的全面拓展，关系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主线的基础夯实。我们必须把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高度上，确保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相关规定在民族地区顺利施行，破除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误区，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

一、语言文字的多维属性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制意涵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表达思想见解、实现沟通交往、型塑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媒介；语言文字对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经济交往、国家治理、文化遗产的意义，宛如空气之于人类一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又习焉不察。

语言文字首先具有社会属性，它是人类社会沟通交往的基本媒介，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见解、抒发情感甚至裁决争议；人类社会中的信息提供、获取、传达沟通，也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因此，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角度来讲，离开了语言与文字，人类就无法从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社会，甚至人作为个体的生活、受教育、能力拓展、工作也需要经由语言文字来进行，正是有了语言文字，人才摆脱了心灵孤岛的状态，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语言文字还具有经济属性，语言文字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经济交往活动赖以组织、进行的基本前提^①，是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在经济市场上加速流动的重要推手，而随着经济市场的扩大和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交流增加，对共通语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整合经济市场、实现利益共享。语言文字在国家治理中更具有重要意义，不同行政区划层级之间的联络通讯、政令畅通，法典、政令、意识形态被民众所熟悉和遵奉，都需要依赖于语言文字尤其是文字。因此，即使是在古代，一个有效治理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也需要依赖于“书同文”和“官话”，还需要具备一批掌握官方语言文字能力的政治精英集团，且这种统一的文字和语言还要代代相传，以确保政治传统的延续。^②语言文字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和文化传统的象征，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延续，离不开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的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与自豪，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也即是说，一个共同的语言文字环境有助于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巩固与凝聚，甚至这种文化属性很多时候还和政治属性发生勾连，如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成为国家认同塑造的重要方式。

正是基于语言文字具有上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属性，在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同体中，会有一种语言文字脱颖而出，成为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日常交流、经济交往、政令传输的通用语言，这是语言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自然规律，也是现实社会经济交流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求。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出于国家政权组织体系深入基层、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双向运动的需求，掌握一种使用较为广泛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进一步地，将这种通用语言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确立其国家通用语言的宪法地位，也同样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立法的通行做法。“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142部成文宪法中，有79部宪法规定了官方语言，占55.6%”^[5]而且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并没有在其宪法中规定官方

语言或者缺乏一部成文宪法，但英语作为两国官方语言的现实功能发挥情况乃至其在本国民族文化中无可替代、不容侵蚀的地位，实际上较之其他国家在宪法典中规定官方语言及其地位的做法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上可见，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语言立法以及语言政策实践中，确立一种官方语言或者国家通用语言可谓是国际通例，同时也是其语言立法的最核心目标所在。这种确立官方语言或者国家通用语言的制宪立法或者政治实践，对各国国家统一、国家建设甚至国家缔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法语对于法国的创建是贡献厥伟的……对意大利的统一而言，意大利文也同样功不可没，它将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连成一线，在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网络”^[6] (P.58)。而众所周知的美国建国，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在论证当时的十三个殖民地何不是组成四五个并立的邦联而是必须结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时，其一大理由即是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之间“语言相同”和“风俗习惯非常相似”^[7] (P.8)。因此，在列国竞争的国际体系中，一国对内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行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巩固公民作为国家民族一员的文化自豪感和政治归属感，是一国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步骤。

从国家建设视角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对语言文字的政治属性尤其是一国通用语言文字在政治秩序塑造中的重要意义有着一个深切的体察，而诸如现行宪法中的普通话条款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对于推广普及普通话与规范汉字的规定，也由此具有了重要的宪制意涵。但诚如苏力所指出的，“中国宪法提到了语言，但一直没人从宪制和宪法层面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深远意义……《语言文字法》也只获得了语文和语言学者的关注，不曾有法律学者从宪制视角的分析”^[8] (P.386-387)。时下从法学、政治学层面对语言文字政策的探讨，更多关注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方言权利的保护；关于语言安全、语言政治的讨论，也以语言学者或者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学者为多；^③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思考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思考宪法中普通话条款的宪制意涵，显然同样值得关注。^④同时，即使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利保障视角出发，我们也要意识到，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还是个人劳动与就业权利的切实保障，乃至通过语言扶贫所实现的经济社会权利享有程度的提升，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以发展促人权，以文化、教育权利的保护带动基本权利的全面保障；甚至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可以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空间；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有通过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获得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护水平的权利。

因此，本文拟从权利保障视角出发，阐明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利、就业工作的权利、文化权利、经济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现实保障和长远利益的真正关注；还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心理基础夯实，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法治统一等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建设的现实命题出发，揭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由此来说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公民权利保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权利保障

“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仅仅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与资格，这显然是不够的。”^[9]中国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强调的是以发展促人权的保障理念，注重权利保护的实效，强调通过提升少数民族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夯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来实现少数民族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保障的整体水平提升；中国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强调的是一种主



动、全面的权利保障，不仅内容覆盖广泛而且还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视为责无旁贷的国家责任，这种国家责任被明确载入现行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正是旨在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少数民族公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少数民族公民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夯实教育基础、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与文化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这是一种强调以发展促人权，注重权利保障实效，强调主动、全面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理念；这种权利保障理念的价值根基则在于社会主义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现行宪法第一条）。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各族人民都是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十六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⑥

在民族地区加大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力度，是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和少数民族公民的民生福祉改善，是语言作为重要的市场要素加速流动的必然要求，也是各民族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环境夯实；而从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讲，则是对于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权、经济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的一种全方位保障。“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10] (P.139)} 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教育实现精准脱贫以及少数民族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受教育权。“接受教育，既是公民个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公民为独立营构自己生活而实现或更有利地实现其所拥有的各种经济权利以及劳动权的重要途径，甚至还是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具体承担者的健全的公民的重要途径。”^{[11] (P.383)} 正是缘于受教育权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与个人发展的特殊意义，我国宪法第46条第1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1条“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投入，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其他教育事业，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规定，更是将少数民族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视为一种国家责任的典型体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抓好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教育投入要加大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无疑是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中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公民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核心的课程资源与学业语言；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也是极为丰富且蕴含着巨大文化、经济、科技能量的教育资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广泛性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无法具备的。当前，全世界的各类历史文献资料和优秀文化成果，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许多最新科技成果和发展动态，绝大多数是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布和报道的”^[12]。而根据祖力亚提·司马义对于双语教育的研究，新疆曾经长期在中小学阶段实行以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主、加授汉语文课的传统双语教育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如学生运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难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理科教学质量难以获得有效提高等问题，这使得不少少数民族家长倾向于让孩子上新型双语班（除民族语文以外的其他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或者直接选择国家通用语言授课的学校。^{[13] (P.53-56)} 因此，大力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使用比重，是对儿童语言认知学习科学规律和教育科学基本规律的尊重和奉行，也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和长远利益的真正保障。也正是缘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保障的决定性影响，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1] (P.219)}。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也强调要“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4]。上述举措均着眼于少数民族公民

尤其是青少年更好地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受教育权保障水平的考虑。

其次是就业、工作的权利。“工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经济社会权利的核心，是最基本的经济权利。工作权不仅是获取物质保障所必须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权利。”^{[15] (P.297)} 现行宪法第 42 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就业和工作是少数民族公民获取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体现个人社会价值并融入社会的关键所在。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坚持就业第一，增强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2] (P.155)}。而要增强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就必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与少数民族公民就业能力增强的关系，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里用维语文、哈语文学习数理化、计算机、会计贸易、医学等专业术语，当他们在城镇单位企业就业时很难与同行交流，无法发挥作用，无法开展业务工作，这样，少数民族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就必然会遇到困难”^{[16] (P.10)}。因此，解决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的少数民族公民的就业工作难题，就必须充分把握少数民族公民就业市场和就业需求格局，从少数民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公民接受教育模式的教育供给侧思路出发，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优化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模式、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为少数民族学生创造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环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均对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强调，也正是立足于少数民族公民个人发展的长远利益、立足于民族地区发展稳定的长远之举；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少数民族公民就业能力增强的关键作用，也正在为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所认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有助于少数民族公民拓宽就业渠道、有助于民族地区扩大就业容量；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脱贫攻坚、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一大举措，即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攻坚工程，几年下来，成效显著。^⑥

再次是文化权利。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容易出现一个常见的思想误区，即担心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会影响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对此，必须予以澄清。第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民族文化权利是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且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层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事业，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享有的广度和保障深入程度都前所未有。第二，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利；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广大少数民族公民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打开了一扇更大的窗口，使少数民族公民可以充分、及时地享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发展成果。第三，就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而言，无论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还是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等，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只会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带来更大的助力和更为广阔的平台。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只有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才能得到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与外在的文化市场的充分沟通。我们所熟知的大量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作品，正是借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媒介向全国各族人民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和文化产业效益。少数民族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掌握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之后，汲取更为丰富的知识与理论资源，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艺特色与现代文艺制作技术相结合，实现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展示少数民族文艺的新时代形象，取得了超越地域、民族的文化影响力，这本身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乃至整个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团结进步、各族人民对

于中华民族的内心认同的一个显著呈现。^⑩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是广大少数民族公民重要的就业渠道和增收渠道，也是通过文化权利保护促进少数民族公民经济权利保护的重要体现，而无论是从事文化产业还是文化旅游业，都需要少数民族公民具备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少数民族公民还是少数民族文化，都需要更大的发展舞台，而不是一个标签化的形象或者狭窄的发展空间；另外，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工作者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在不同文化资源的互动中发展，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条件支撑进行传承；对于少数民族公民的文化权益保护，需要享受更为丰富的文化成果、具备更大的展示平台；而且通过文化产业的模式实现经由文化权利的保障，促进经济社会权利的全面保障，也同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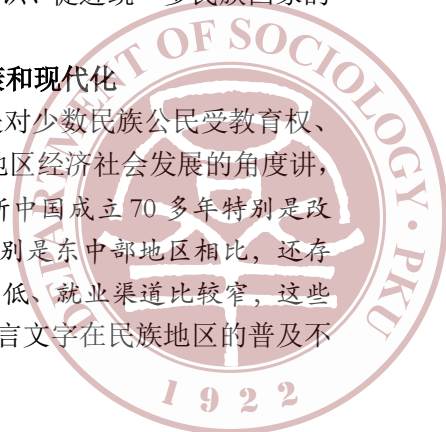
因此，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造成损害；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成绩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恰恰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工作权、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真正保护的长远之举。在民族地区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脱贫攻坚工程，是党和国家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利保护、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统筹安排，是尽力通过各种措施为少数民族公民个人成长、经济增收、融入社会提供良好环境的国家责任担当和社会主义理念体现。如果我们考虑到“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4]，让离开原聚居地的少数民族公民更好适应城市、融入社会、保障权利，就更需要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只有让他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才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在更为广阔的舞台发展，才能更加适应这个“大流动、大融居”的社会。

三、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就不能仅仅从少数人权利保护制度或者地方治理制度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是直接关系到整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4]。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民族政治的现实制度建构，用一种更为细致，更具亲和力 and 认同感的方式，来加强多民族国家内在的有机凝聚与认同塑造，便成为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的核心课题”^[17]。因此，党和国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民族事务具体工作部署，如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依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便同样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意蕴。而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上述民族事务的具体工作实践中都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于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我们必须将其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上加以理解。

（一）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角度讲，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工作权、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进行切实保护的长远之举；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则是民族地区完成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中部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掌握科技知识能力偏低、就业渠道比较窄，这些都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够有密切关系。”^[18]可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普及不



够，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影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夯实。

在民族地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而在民族地区“发展农牧业、农畜产品加工业、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21] (P.156)，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旅游业，都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具备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尤其是在如今互联网+、平台经济如火如荼的时代，民族地区如果充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可以更好地搭上新兴经济的时代航轮，获得更为丰富的商机，融入更为广阔的全国市场。如果我们把就业市场、发展空间投向全国，当少数民族公民走出边疆民族地区，来到东部沿海城市进行就业与发展，则更需要具备熟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些年民族地区的语言脱贫攻坚工程，通过对于民族地区适龄劳动人口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异地就业发展的显著成就，也证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实现脱贫攻坚、解决就业难题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视经济基础的夯实与经济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凝聚。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在我国即将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谋划好“十四五”期间的民族地区发展大计。其中就必须以更高的政治大局意识，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夯实角度，以更为坚决的态度，着眼长远，加大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以此让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康庄大道。

（二）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战略任务的大局出发，明确将“加强交往交流交融”部署为民族事务领域必须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事项，并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念与要旨做了系统阐述：“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趋势，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正确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通过扩大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21] (P.107)

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只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则是语言文字的相通。一方面，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整体上看，中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在微观层面，受自然和人文等多重因素影响，尚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群众，与其他群体存在程度不同的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心理隔离”^[19]，而这种疏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语言的不通。另一方面，在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的社会背景之下，“以往民族工作所依赖的区域格局、人口构成、民族分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工作的对象正在从民族地区扩展到中东部地区，从农牧区扩展到城市”^[21] (P.281)；如果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公民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和群体，而是“聚族而居，形成小的文化相同、习俗相近、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密切的群体，而这

种聚居形式又与周围社会形成相对隔离,使他们更难以融入迁入地社会与当地民众相互认识和彼此认同”^[20],而这种“分区聚集而居,这个民族一块,那个民族一块”^[21],也自然会导致共同体成员对于作为次级共同体的民族归属感得到极大的增长,而影响到作为一体的大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也由此受到侵蚀。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搭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沟通桥梁,只有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学生到了学校才不会“各抱各的团、各转各的圈”^{[2] (P.269)},进了城的少数民族群众也才能够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不是“各民族按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分区聚集而居、抱团扎堆……形成城中村、贫民窟、民族屯”^{[2] (P.291)}。因此,只有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才能确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顺利进行,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的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2] (P.25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除了从加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密切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角度发力,还需要意识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 (P.25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本身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的产物,也是几千年来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更是中华各民族文化集大成的生动体现。“普通话的前身北京官话,上溯元明、推广于清代。普通话的标准音采集点,是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2%的承德滦平县。可以说,历史上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对现代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是‘多元’的‘要素和动力’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性做出的贡献。”^[22]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也涌现出不少以汉文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元好问、贯云石、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他们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名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历史上氐族、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满族等出身的政治家,也体现出非常好的汉语文造诣,汉语言文字也是历代中央政权处理政令的通用文字;而《敕勒川》《木兰辞》等流传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民歌,也同样为中华各族人民所吟诵、传唱,成为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一大批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结合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吸收中华文化的宝贵养分,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为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作品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推动力。但是,关于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生活中仍然不乏一些错误的认识。^④“繁荣和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做”^[23],不能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我们强调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但同样不能对其片面理解,不能以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为借口削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地位,阻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妨害少数民族公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权利的享有。

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4]。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语言文字载体,也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充分使用、传承发展不可或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民族地区教育文化水平的

飞速发展、随着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不断普及推广，各族人民会越来越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也将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珍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必将由此得以进一步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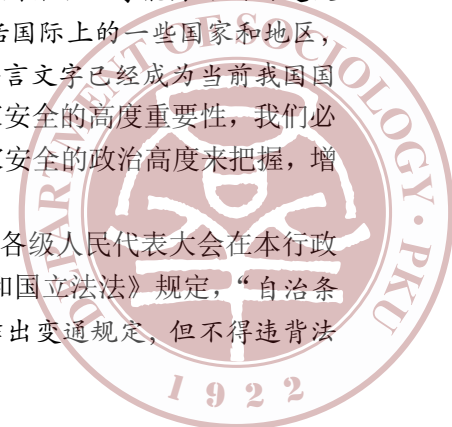
（四）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捍卫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述规定明确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和法律地位，阐明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属于国家事权的权力属性，也表明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全国各族公民所享有的法定权利，也是全国各族公民所必须遵循的法定义务。

国家建设除了需要注重政权建设、制度建设的刚性一面，还需要塑造和强化政治共同体成员国家认同的柔性一面。“国家认同建构依赖多种资源，国家象征是其重要资源之一。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是国家在进行国家交往中所依赖的识别标志；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是国家整合社会和创造公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24]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则正是一国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和国家认同塑造的重要载体。因此，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其推广和普及除了具有提高各族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以及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交流等现实功能以外，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便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所体现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符号功能。纵观世界各国立宪史，语言文字常常与国旗、国歌、首都一起被宪法明确为国家象征，而滥觞于近代中国的国语运动、汉字改革运动，同样一开始便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大背景密不可分。^⑨在我国宪法文本中，诚如尤陈俊所指出的，“虽然没有将语言与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和标志规定在一起，但语言与国族认同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仅同样值得关注，甚至更为历史久远”^[25]。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强调，实际上已经是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承担的象征国家主权、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使命。

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还关涉国家安全。一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受到阻碍或者侵蚀，实际上也是对其国家安全的危害。当今随着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各种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我们除了要重视传统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国家安全领域外，还需要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国家安全。而语言文字这个看似技术性的领域，实际上同样也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一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安全，本身即为一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其他国家安全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典型的即语言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系，如部分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常常从部分族裔语言的地位无限拔高开始或者通过语言政治的手段来实现其政治分离目标。^⑩诚如苏金智所指出，“在国家统一、国家认同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方面的建设处在国家语言能力中的核心基础地位。应该看到，台独、港独，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家分裂往往从不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始。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国家语言能力提升的重中之重”^[26]。因此，鉴于语言文字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要性，我们必须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来把握，增强各级部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坚定性和执行力。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



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持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因此，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政策推行和立法设计，也需要遵循上述宪法、法律的规定，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和法律地位，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统一。

结 语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多语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做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事关国家主权彰显和民族团结。这决定了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语言文字政策方面，统筹推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我国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基本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对此，我们应当有高度的制度自信与政治定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的产物，也是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的象征标志和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工作权、文化权利、经济权利的全方位权利保障，有利于民族地区的民生福祉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夯实，是真正的功在千秋、利在长远的国之大计。我们应当牢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和法律地位，同样必须成为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的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2] (P.267)}，强调“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18]，要求“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4]。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27]。我们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根据党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中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提升的总体部署，从少数民族公民的长远权益保护的考虑出发，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需求出发，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出发，统筹安排、精准施策，坚定不移、坚决有力地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战略任务。

注释：

- ①参见李宇明《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3期）一文中的具体分析。
- ②参见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第八章中关于古典中国时代“书同文”与“官话”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型塑中所起的作用。《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387页。
- ③如张治国《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刘跃进《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等等。
- ④晚近的一篇关于现行宪法文本中普通话条款的研究，见于尤陈俊《法治建设的国家能力基础：从国族认同建构



能力切入》(《学术月刊》, 2020年第10期), 作者梳理了新中国制宪历程中关于普通话条款的相关讨论并分析了语言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 ⑤关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根基, 可参见常安《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学术月刊》, 2019年第9期), 常安《理解民族区域自治法: 社会主义的视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年第4期)等文中的相关分析。
- ⑥“经过笔试和面试,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100多名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在江苏昆山的一家企业顺利就业。而在来之前的培训班上, 一些青年甚至不会用汉字写自己的名字。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幕。2016年, 云南省启动了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攻坚工程, 开展普通话培训, 几年下来效果明显, 截至目前已完成9.96万名劳动力培训”。参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人民日报》, 2020-09-09。
- ⑦如《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等影视节目中涌现出的吉克隽逸、旦增尼玛、阿兰等少数民族歌手, 通晓民族音乐、国家通用语言、现代音乐制作技术, 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也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的丰富面向和少数民族公民文化艺术创作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阿来、艾克拜尔等作家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了藏族、哈萨克族的文化魅力, 同时也体现出作为中华民族精英的担当。用艾克拜尔的话说, 就是“汉语受众面广, 传播迅速, 这使得我与用母语创作的作家相比获得了某种优势”, 同时, “用最优美的中文, 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 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 也是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精英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的真情流露。参见《用最优美的中文, 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访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 中国民族文化资源网, <http://www.minzuet.cn/eportal/ui?pageId=663068&articleKey=742556&columnId=729508>, 2018-10-26。
- ⑧如有学者指出, “在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民族工作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认同, 但中华文化的培育和认同有所忽略, 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得到增强、文化边界有所强化, 而中华文化认同却逐渐衰落。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民族团结, 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和人们凝聚力的增强”。参见崔榕《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
- ⑨对此可参见王东杰的出色研究, 《声入心通: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 ⑩如根据翟晗的研究,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于1978年制定并实施的《语言规范法》, 标榜保护和推广加泰罗尼亚语, 其实质则是采取“语言浸入政策”, 作为缓慢培养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意识的长期手段; 而西班牙宪法法院对此则缺乏足够警觉, 在遏制分离的相关关键判决上也存在疏忽, 为后来加泰罗尼亚分离势力坐大留下了空间。参见翟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危机的再审视》(《欧洲研究》, 2019年第5期)中的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 [1]王启涛, 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经验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20(11).
- [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 [3]教育部、国家语委, 关于印发《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3127/s7072/201609/t20160913_281022.html, 2016-09-13.
- [4]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
- [5]王晨, 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周年之际[N]. 人民日报, 2020-11-11.
- [6][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7][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约翰·杰伊, 詹姆斯·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第二篇)[M]. 程逢如, 在汉, 舒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8]苏力, 大国宪制: 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9]陈波, 道德权利、法律权利、现实权利——列宁与邓小平人权观比较研究[J]. 法学评论, 1998(2).
-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11]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 宪法学专题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 [12]陈荟等, 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公平之义[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3).
- [13]祖力亚提·司马义, 民族教育政策在新疆教育中的实践与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14]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4号)[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9/content_5161341.htm, 2017-01-19.
- [15]徐显明, 国际人权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 [16]马戎,从社会学的视角思考双语教育[A]//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17]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J].开放时代,2020(1).
- [18]巴特尔,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的共同责任[J].中国民族,2020(9).
- [19]李俊清、卢小平,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中的公共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6(12).
- [20]李晓霞,大力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J].中国民族,2015(3).
- [21]朱维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重在交融[N].人民政协报,2016-12-15.
- [22]郝时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N].人民日报,2018-10-31.
- [23]丹珠昂奔,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J].民族论坛,2014(12).
- [24]殷冬水,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基于国家象征视角的政治学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6(8).
- [25]尤陈俊,法治建设的国家能力基础:从国族认同建构能力切入[J].学术月刊,2020(10).
- [26]苏金智,国家语言能力:性质、构成和任务[J].语言科学,2019(5).
- [2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

【论 文】

流动视域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¹

王浩宇²

摘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与使用,既是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民族构建的必然结果。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特征,流动性的提升不仅推动了工业经济的标准化发展,为通用语或共同语的出现、使用和普及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为人们通过统一的语言文字“想象”国家民族与构建身份认同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语言发展的网络经济效应决定了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推动各民族成员实现社会流动、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语言的功能拓展性与跨文化交际为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而反哺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进一步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蕴含的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增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安全的内在价值。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政策;社会流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语言秩序问题能否得到合理解决直接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从世界各国的典型案例来看,由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语言边界与领土边界往往存在错位现象,受到某些历史文化因素和错综

¹ 本文刊载于《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1期。

²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群体的重要特征总是容易被形塑为“权利斗争”的工具，甚至在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之下诱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全球化时代流动性的持续提升，既为语言文字发挥政治统合作用创造了客观条件，也对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语言秩序带来了现实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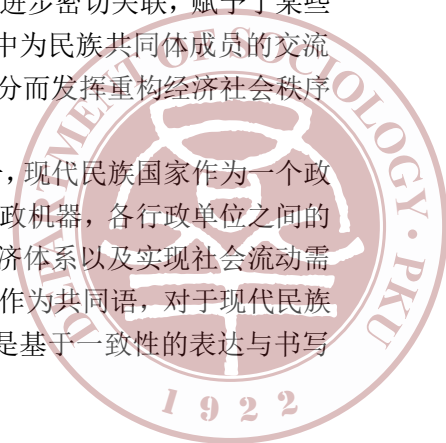
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精准脱贫^[4-5]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路径与方式^[6-8]。可见，学界已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意义。但从整体来看，相关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特别是需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以动态性视角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民族国家整合与国家民族构建的作用展开系统性研究。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不断提升，不同区域之间人员、商品、信息、资源、技术等大规模的交流或交换，当代中国展现出“流动中国”的景象。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兼备工具性、思维性与符号性特征的表意系统，是不同文化群体进行深入而广泛交流的基础性工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得与使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实现社会流动以及全面参与国家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结合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从流动视角考察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秩序的形成及其对国家民族构建的特殊作用，并对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和使用问题展开讨论。

一、流动性与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秩序的形成

流动性的持续提升是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特征。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化被视为由于人类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而使人类得以控制其环境，各种传统制度适应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社会各单元需要对这一新环境和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与适应^[9]。例如，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只有极小部分的个体能够读书识字，而不同个体之间通常以血缘和亲族网络为基础进行聚合并构成社会单元。但伴随着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一支具有流动性且能够进行读写和计算的劳动大军，这样的劳动大军需要参加有关语义的工作并作无关语境的交流^[10]。现代社会的有序运作以非传统化的个体及其流动为基础，个体也被整合进“工业机器”之中，语言文字由此成为“粉末状社会”新的凝固剂。

在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整合密切相关。首先，印刷语言为原本难以或根本无法实现交流的个体创造出互动和交谈的场域，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等“中介”，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和理解。其次，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的阅读空间中形成有关民族共同体想象的胚胎。再次，“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与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即语言地位之间的分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密切关联，赋予了某些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11]。语言文字不仅同时在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中为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交流与互动创造了客观条件，也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重构经济社会秩序的功能。

如果没有某种语言秩序的形成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识字率的提升，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无法实现构建与整合。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包含无数单位的行政机器，各行政单位之间的协调运作首先需要以标准化的文本为依托，个体不断进入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实现社会流动需要以标准化的语言为工具。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选择某一种优势语言作为共同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是迟早的事情^[12]。现代民族国家的内部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致性的表达与书写



而实现的。共同的语言文字除了有助于国家管理各类行政事务和数量庞大的人民，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任何政府都会通过公立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投入强化某种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所有公民都有机会获得实现社会流动和进入标准化工业经济体系的基础能力。

语言文字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实现整合的基础。吉登斯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国家成了一个行政和领土有序化的统一体，这在以前还未曾出现过。这个统一体不可能纯粹是行政性的，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通讯的扩大不可能离开‘观念’上对整个共同体的把握，这个共同体是能知能识的公民总体。共享通用的语言和通用的象征历史性是达致‘观念共同体’的最彻底的方法。”^[13]事实上，也只有当民族国家的领土空间，即物理边界与某个语言共同体紧密重合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与行政效率才会获得大幅提升。或者说，鉴于现代民族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袤的领土空间，现实条件不可能为所有民族共同体成员创造彼此能够直接交流互动的机会，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彼此的认同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就变为一种想象的产物，而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些相似性的信念。如同构想共同体本身一样，人们也在构想统一的语言秩序。大多数语言使用者之间不会发生直接的语言交流，但为了能够充分参与各类国家事务与公共活动，以及受到通用语或共同语在现实中的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影响，人们总是期待彼此语言行动的一致^[14]。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不要求所有成员在社会行动上完全相同，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或观念共同体，应当使自身具备某种团结纽带。人们凭借这种纽带就能够在公共事务中达成联合行动的条件，而共同的语言文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概念凸显了统一的语言秩序在现代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在绝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包括在大多数城市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延伸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固。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15]时空延伸水平的提升使得非地域性的再嵌入成为可能，也使得各类社会行动可以从地域化的情境中被“提取”出来，并穿越广袤的时空距离重组多元化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场域”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行动所影响并据此建构而成，共同的语言文字为现代民族国家灌输爱国主义及同质性文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语言秩序与国家民族的构建

一般来说，一种语言成为事实上的国语、官方语言、国家通用语或共同语，都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其使用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人口众多，生产技术较为先进，而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为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团结发展格局创造了天然的条件。一方面，这一现实情况决定了各民族成员只有相互依托、相互帮助，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汉族聚居的沿海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汉族社会的现代文化因子对各少数民族具有一种天然的、强大的吸引力^{[16] 579}。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在1949年之后，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逐渐拥有国家标准语的合法地位^[17]。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已经形成互补关系——少数民族语言从汉语中吸收所需词汇，汉语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一些词汇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普通话”本身体现出较强的建构性特征，将后来的国家通用语理解为“汉语”或“汉语普

“普通话”是不准确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哪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它是伴随中华民族共同体成长、中国国家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言文字。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

中国国家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发展中存在交叉同构关系^[18]。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是交互作用的过程,即国家构建本身隐喻并推动着国族构建的内容,而国族构建又巩固了国家构建并推动着国家的发展^[19]。因此,某种语言秩序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往往也是一个语言逐渐成为构建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内核而被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例如,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兴起就已体现出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民族构建的努力。1926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指出,“国语运动”的方针为“两纲四目”。“何谓两纲?一曰国语统一,二曰国语普及。何谓四目?因为国语统一含有两种意义:一曰统一,二曰不统一。国语普及也含有两种意义:一曰普及;二曰不普及。但‘国语统一’者,为的是全民族精神的团结,而‘不统一’者,为的是各地方特性的利导;‘国语普及’者,为的是全民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普及’者,为的是各专家创造之增进。”^[20]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用语言文字工具将整个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上团结并武装起来,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语言观念之一^[21]。虽然日本侵略者通过战争在这一时期给予中国的语文运动重创,但以“两纲四目”为核心的“国语运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通过创造语言秩序推动民族国家构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比如,日本语言秩序的统一为其国家民族的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国家民族构建的重要阶段。当时,铁路通过连接农业劳动力储备地与城市工业地区,以及模糊城市与其周边的界限,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随着铁路把越来越多的地方与大城市连接起来,东京逐渐成为决定日本全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地方^[22]。然而,由于当时日本不同区域的书面语差异很大,口头语也存在很多方言变异,这给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与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巨大的障碍,随之几种语言文字改革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广泛讨论。日本文部省于1903年批准了第一批“现代标准日本语”教科书。此后,日本致力于语言的标准化建设。1934年,日本“国语审议会”规定:标准语以受过教育的东京居民的口语为准,一系列的标准语活动都需要通过教育系统广泛开展^[23]。

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秩序的形成成为国家民族的构建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国家民族在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自身,对民族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塑造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属性,同时对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发挥了塑造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国族机制的支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都是不可想象的^[24]。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共同语或通用语的出现以及相关语言秩序的形成,为国家民族叙事的连续性创造了客观条件。若缺少这种连续性,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机制无从建立。对于具有“大传统”或某一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共同语或通用语不仅是国内各民族语言中文化积累最为丰富的语言,同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与自下而上的语言实践往往是一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各民族成员交际的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14]。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少数民族成员社会流动

在现代社会中,交通运输的发展首先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流动空间,为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通、资源交换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范围不断扩大、流动频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标准化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文字本身也已经变成一种标准化的事物。语言文字是一种网络,为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沟通、联系与互动提供渠道。一种语言使用越多,语言网络系统用户就越多,个体用户的受益

就越大^[25]。在社会流动性不断提升的作用下，语言由此成为一种高度集体化的媒介。在现代民族国家庞大的公立教育和义务教育系统的支持下，所有个体都可以获得学习某种使用价值较高的语言的机会，而这进一步提升了这种语言的使用价值，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和使用这种语言。

在任何一个国家，习得某种通用语言都是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和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条件。1949年后，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在自己使用的语言中不同程度地缺少反映新思想和新概念的术语，因此必须从汉语里吸收大量的新词汇来补充自己的词汇^[26]，进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语言兼用或语言转用现象。特别是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各民族成员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为彼此关联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创造了共同的交际空间，也日益成为现代知识体系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创新与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成员在行政管理、商贸金融、教育医疗、工程技术、军事安全、艺术文化等各个职业领域取得成功，也需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工具进行学习。从语言选择角度看，人们要坚持一种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眼光，客观认知哪一种语言（学校教学语言）的出版物提供的信息能够最好地帮助这个民族在科学、技术、人文等各个学科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27]。

如果简单地认为，让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所有语言都获得同等的使用功能和地位，或是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学习，就能保证不同语言之间的绝对公平，那么其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甚至会进一步扩大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社会分层。只有当各种语言在某个社会环境中完成特定、明确的功能分化，不同语言之间才能真正形成共生的关系。正如苏·赖特所指出的：“制定标准语，允许在某些情况使用它可以淡化阶级分化，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流动。”^[28]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机械地、刻意地维系语言差异，或是没有为所有民族成员提供通用语或共同语的学习机会，那么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部分民族成员实现社会流动的目标。这会影响到民族整体的发展与进步。

语言的生命在于使用，语言只有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使用功能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语言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这个环境是由具体的人、行动以及事物所构成的。任何脱离人类社会活动的、孤立存在的语言，很难称为真正的语言。或者说，没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很难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个体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将掌握某种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本身又能够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本，促进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那么在各类社会情境特别是教育系统中掌握强势文化资本的个人，更容易获得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渠道。布迪厄在论述教育问题时指出，教学机制偏向于规范的语言表达者^[29]。

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

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亨廷顿认为：“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30]一方面，自秦汉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各民族成员的跨区域流动与交流交往的加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早已形成互补与融合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流动速度的提升持续创造出“时空压缩”的效应。然而，这不代表空间本身正在失去意义。流动速度的提升与流动范围的扩大，使得竞争变得愈发激烈，资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地方优势，为了更好地参与竞争，空间障碍的缩小迫使资本更最大限度地利用哪怕是最小的空间差别^[31]。在不同民族之间，其所拥有的文化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变得非常

有“意义”。而语言作为文化表现的重要工具，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一个不同文化群体接触日益频繁的时代，无论从语言的功能意义还是从象征意义上看，人们在与其它民族相互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反而越来越不可能终止其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32]。例如，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单语制国家，具有强烈的单语语言意识形态和严格的语言使用管理措施。法国目前与语言有关的政府机构以及负责维持法语地位的委员会就多达十几个。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斯克语、布列塔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科西加语等地区语言在法国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法国的法语单语制也始终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语言竞争压力^[33]。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这种语言发展的二元化机制本身就维系着人们对本族语的认同。国内外相关事实证明，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使用不会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产生剧烈的冲击，反而有积极意义。

另外，语言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于语言总是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部分人看来，语言不仅是民族文化表达和表征的工具，其对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还在于本族语往往比其他语言更加适宜表达这一语言群体所属的文化。但是，这一朴素认知的逻辑至少无法回应和解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充分发展了的交流工具，都正在或曾经为特定群体的生产生活提供支撑，因此不存在任何一种语言比其他语言更好，任何一种语言也都都不可能适用所有文化中的所有使用^[34]。人类社会的交流和发展趋势决定了语言的本质是一个功能概念，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表意需求，即具备功能拓展的特性。第二，虽然一种语言和一定的文化相互联系，但是这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不能通过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也不意味着一种语言不能传递另一种文化^[35]。否则，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就不可能如同当前这样进行广泛而密切的交流，跨文化交际更不可能成为普遍事实。

基于上述逻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使用不仅是民族共同体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石，也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民族共同体文化具有世界共通性和全国统一性。共通性使人们可以客观地比较和评估各国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统一性则是建立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内市场的历史要求使然^{[16] 212}。这两者在全球宏观层面为民族共同体文化提供比较尺度的基础之上，也为各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更大的发展与传播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利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又会促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以及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进一步说，不断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使用，有利于给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费孝通指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这个规律同样可以用到民族领域里的话，经济越发展，亦即越是现代化，各民族间凭自己的优势去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也越大。”^[36]很多研究表明，无论是全球化、现代化还是大众化，都不完全是同质化或一元化的趋势，而是一个多元互动、取长补短的发展过程。少数民族成员主动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积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此为工具全面了解和掌握前沿知识系统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有利于为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五、结 语

《礼记·中庸》写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的规模自然有限，各个层面的“同”与今日更是无法相提并论。但将“车同轨”和“书同文”视为文明进步的条件，表现出了一种卓越的历史眼光。中国的历史不全是统一的历史，受到民族、地域、



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长期分裂的状况。但在此后国家形成发展中,伴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语言文字的融合,立国基础往往都比历史上的统一国家更为坚固,整合程度更为深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可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使用,既是民族国家整合的路径,也是国家民族构建的结果。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是推动各民族成员社会流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民族团结、提升国家凝聚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这一认识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识。未来应不断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继续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营造少数民族成员积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环境。要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教育全面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也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继续鼓励生活、工作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积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挥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 [1] 青觉、吴鹏.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性工程[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9): 173-181.
- [2] 王启涛. 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经验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20(11): 1-7.
- [3] 刘元贺. 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2018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 2020(4): 76-83.
- [4] 石琳. 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J]. 社会科学家, 2018(4): 150-156.
- [5] 王浩宇.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1): 67-75.
- [6] 王晖. 论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推广的“时效度”[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4): 14-24.
- [7] 陈芸, 桑尔璇, 李晓贺. 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公平之义[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3): 79-85.
- [8] 朱碧波. 论我国边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困境与突破路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2020(6): 27-33.
- [9]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13.
- [10]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叶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69.
-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43-44.
- [1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李金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54.
- [13] 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赵力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64.
- [14] 王浩宇. 多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国家通用语及其相关问题[J]. 新疆大学学报, 2018(4): 79-84.
- [1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90.
- [16] 宁骚. 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17] 王东杰. 官话、国语与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J]. 学术月刊, 2014(2): 155-170.
- [18] 韩克芳. 中华民族共同体法治建设:价值、基础与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5): 25-29.
- [19] 陈建樾. 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国族的整合历程——基于美国的考察[J]. 世界民族, 2015(1): 2-13.
- [20]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259-260.
- [21] 黄晓蕾.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89.
- [22] 斯蒂文·J. 埃里克森. 汽笛的声音——日本明治时期的铁路与国家[M]. 陈维、乐艳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72.



- [23] 罗伯特·B.卡普兰,小理查德·B.巴尔道夫.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M].梁道华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27-28.
- [24] 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0(3):79-98.
- [25] 博纳德·斯波斯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02.
- [26]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4.
- [27] 马戎.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1):6-18.
- [28] 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3.
- [29]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6.
- [30]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09.
- [31] 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M].徐鹤林、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25.
- [32] 王浩宇.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4):16-22.
- [33] 博纳德·斯波斯斯基.语言管理[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8-239.
- [34] 韩礼德.语言与教育[M].刘承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4.
- [35] 朱跃,朱小超,鲍曼.语言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 [3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35.

【论 文】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研究¹

——基于云南民族地区的抽样调查研究

焦开山、郭靓雯²

摘要: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相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显著影响其国家认同水平,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会越高。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差异。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国家认同

一、问题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当前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方针[1],也是实现

¹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² 作者: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靓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2]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阐释及研究过程中，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语言文化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作用。^[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4]（P.268）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①，是国家语言生活最重要的知识信息交流传播工具^[5]，推广好、普及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②。将普通话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旨在强调其在正式官方场合的通用性，在不同方言、语言地区的通用性。^[5]因此，深入研究各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多元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语言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关于语言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首先，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语言与国家认同之间具有重要的关联，“民族和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建立和维持的”^[6]。语言不仅具有人际沟通的功能，而且具有身份标志的功能，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往往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手段之一。^[7]其次，目前学界在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场合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是增强还是削弱国家认同尚存争议。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及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社会群体在不同情境下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更为频繁^[8]，这种情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最后，目前学术界对语言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关系研究，大部分依旧处于理论层面，相关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

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情况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对国家的认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进一步建构或强化其国家认同。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

二、文献综述

“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还是新近建立的国家，国家认同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举足轻重且随时代不断变化的问题。”^[9]它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又是治理现代化的心理基础。^[10]从公众个体角度讲，“国家认同是可变的”^[11]。基于此，探索公众国家认同的建构性成为持续的研究主题。

在所有影响国家认同因素中，语言是重要的因素。在结构观看来，“群体”具有某些固定的本质要素，语言被视为特定群体认同的象征^[12]，也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一方面，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塑造个人和群体的价值、心理、文化和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语言是获得群体成员身份资格^[13]的重要要素，具有身份认同的功能。在社会建构视角看来，语言与社会认同之间是相互构建和动态变化的。社会认同既不是社会结构的附属品，也不是个人内意图的产物，而是在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和互动情境中与语言互为建构的，它是一个多元、流动的过程^[14]。个体可以通过语言主动选择、表达及强化自己的社会认同。以往经验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化认同价值和工具实用价值都有较高的认同度，对国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也持积极态度^[15]。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具有更加明显的“工具性”，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而且也是升学求职并尽快融入社会的重要手段^[16]。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较为复杂，个体往往根据所处的多维社会语言互动情境使用不同的语言，表现出复杂的认同。以往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二者在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认为，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会增强国家认同。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会依附于社会群体的权力结构，如果外部权力结构（如国家）过于强大，那么少数民族或群体就会选择服从于这个权力结构的安排[17]。在许多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在习得优势语言后就不再进行频繁的语言转换活动，他们更愿意保持使用优势语言并认为其获得的国家认同比本群体认同更为重要^[17]，也更倾向于选择适应外部生活。不过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群体会在语言差异中建构民族差异，进而削弱国家认同。随着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功能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人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也会不断增强。当民族认同对于个体而言变得重要的时候，个体往往会通过语言差异来标榜自己并给予本民族语言较高评价，从而不断强化本民族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18]。

从实证研究结果看，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和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社会群体进行着密切的接触和交往。有研究发现，受国家通用语言熟练程度的调节作用，人口流动影响国家认同，对于懂得国家通用语言的公众，人口流动对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随其熟练程度的提升而增强^[19]。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语言使用状况呈现多语化趋势，即和家乡人说家乡话或民族语言，在公共场合说国家通用语言^[8]。也有研究认为，当前社会不同群体“向国家通用语言靠拢”并非消除方言或民族语言，而是将其局限于特定的交际空间和交际人群^[20]。从交际人群看，人们会根据关系远近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与亲戚等亲情圈的人谈话时，居民往往转用家乡话；与同事和其他民族的朋友、陌生人等社交圈的人谈话时，居民一般选用国家通用语言^[21]。当交际空间为公众场合时，居民选择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比率增加；而置身于较为封闭、私人的场合时，居民选择国家通用语言比率会下降。对于个体在方言或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中频繁转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一方面国内学术界虽然对语言与社会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依旧处于理论层面，相关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在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具体关系上并未达成共识，而且对个体在方言或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中频繁转换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证研究。鉴于此，如图1所示，本文一方面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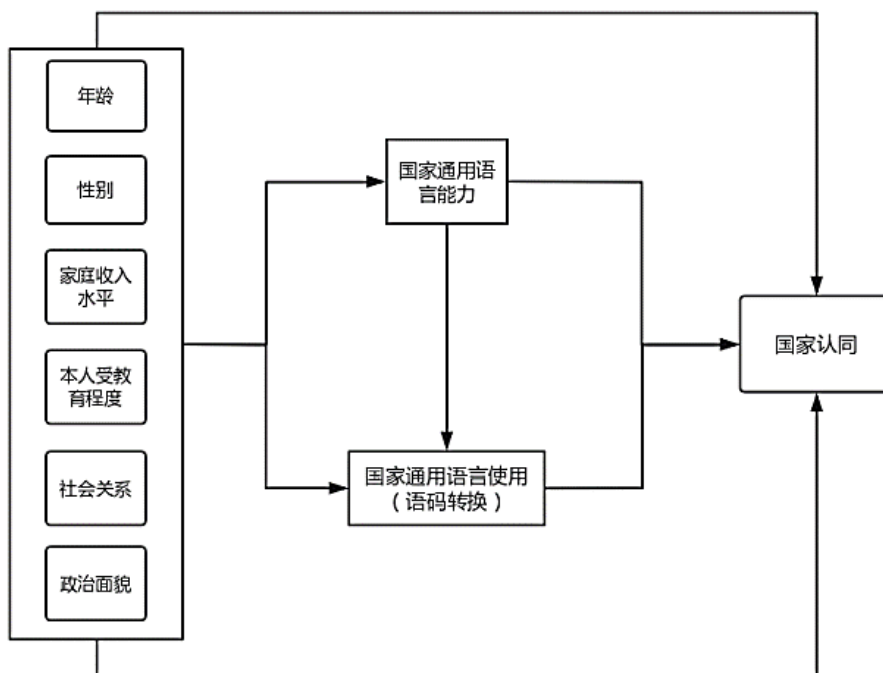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的研究框架

三、数据和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于等于云南省平均水平(33.39%)的县(区)定义为抽样的总体,总共69个县(区);然后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了160个村(居)委会,在每个被抽中的村(居)委会中,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25户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的成年人中随机抽取一名成年人进行访问。在剔除汉族样本和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为2244人。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含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样本。

(二) 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包括个体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等,它描述的是个体对所属国家的感情强度和依恋程度,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忠诚、爱以及关心。根据受访者对以下关于国家的看法与感受四个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1)我曾花时间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习俗;(2)当别人批评我们国家的时候,我觉得像在批评自己;(3)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4)我每次听到国歌的时候会很激动。每个问题有4个选项,分别是“不符合”(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比较符合”(编码为3)和“非常符合”(编码为4)。由上述4个问题构成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0.75,信度较高,可以用于构建一个国家认同综合指数。本研究首先用这四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等级项目反映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一个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③。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国家认同感越强烈。

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测量包括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说国家通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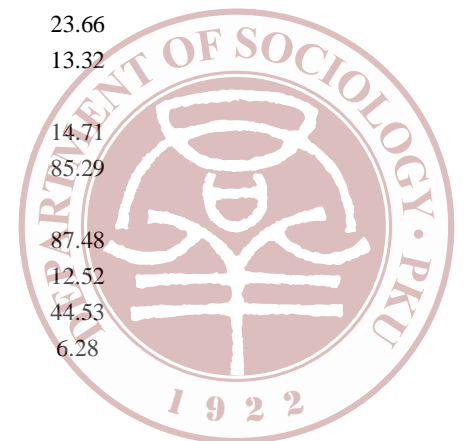
言能力。首先采用李克特量表对每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 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然后对个体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计分和说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计分进行加总，总和作为个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取值范围在 2 分到 10 分之间。

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测量，侧重于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群体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如果受访者在与家人交谈、朋友聚会两种情境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则为有（编码为 1）；如果在上述两种情境下都没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则为无（编码为 0）。

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这些因素可能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或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收入、教育、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根据样本的四分位数，把家庭人均年收入总共划分为四个等级：低（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样本的 25% 分位数，编码为 1）、中低（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样本 25%-50% 分位数之间，编码为 2）、中等（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50%-75% 分位数之间，编码为 3）和中高（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样本 75% 分位数，编码为 4）。受教育水平被划分四个等级：文盲/半文盲（编码为 1）、小学（编码为 2）、初中（编码为 3）、高中及以上（编码为 4）。政治面貌分为两个类别：群众（编码为 0）、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中共党员”，编码为 1）。社会关系根据受访者是否有亲属在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工作的回答结果分为两个类别：有亲属在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工作则被认为在政府里有关系（编码为 1），没有任何亲属在县级及以上部门工作则被认为在政府部门没有关系（编码为 0）。本研究的自变量还包括性别、年龄变量。其中性别是二分类变量，男性编码为 1，女性编码为 0；年龄是时变变量，取值范围在 18 岁到 83 岁之间。

表 1、变量测量及其分布（N=2244）

	计数	百分比（均值）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无	1434	63.90
有	810	36.10
性别		
男性	1293	57.62
女性	951	42.38
本人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458	20.41
小学	868	38.68
初中	685	30.53
高中及以上	233	10.38
家庭收入水平		
低	760	33.87
中低	654	29.14
中等	531	23.66
中高	299	13.32
社会关系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	330	14.71
没有亲戚在政府部门	1914	85.29
政治面貌		
群众	1963	87.48
中共党员	281	12.52
年龄	2244	44.53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2244	6.28



（三）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合两个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模型 1 中，只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控制变量。然后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得到模型 2。通过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否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有显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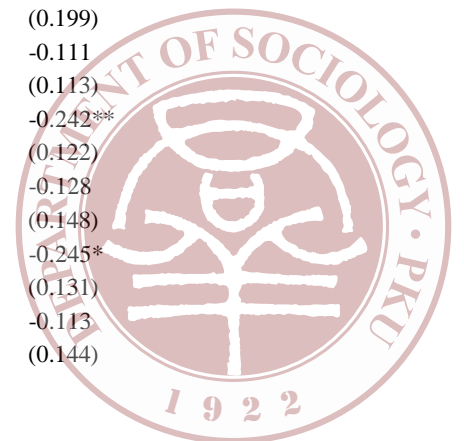
为了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本研究拟合四个线性回归模型。首先，在线性回归模型 1 中，只加入控制变量；其次，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得到模型 2，考察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是否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再次，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变量，得到模型 3，考察国家通用语言是否对国家认同有显著影响；最后，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使用的交互项，得到模型 4，考察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因素的调节。全部模型用 STATA 16 进行估计。

四、研究结果

表 2 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由模型 1 可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最重要因素，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半文盲群体相比，受过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发生比分别高出 51%、66% 和 221%。通过综合比较模型的拟合度（卡方值=11.16，自由度=1，P=0.001），模型 2 是相对较优的模型。根据模型 2，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有显著影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发生比约高出 10%。

表 2、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	
	模型 1	模型 2
男性（女性）	-0.130 (0.092)	-0.132 (0.092)
年龄	-0.001 (0.004)	0.003 (0.004)
小学（文盲）	0.412*** (0.130)	0.336** (0.132)
初中（文盲）	0.505*** (0.142)	0.352** (0.150)
高中及以上（文盲）	1.165*** (0.189)	0.961*** (0.199)
中低收入（低）	-0.101 (0.113)	-0.111 (0.113)
中等收入（低）	-0.214* (0.122)	-0.242** (0.122)
中高收入（低）	-0.077 (0.147)	-0.128 (0.148)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没有）	-0.221* (0.131)	-0.245* (0.131)
中共党员（群众）	-0.041 (0.142)	-0.113 (0.144)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99*** (0.030)
截距	-0.783*** (0.226)	-1.456*** (0.305)
样本量	2244	2244
对数似然值	-1442.486	-1436.904
自由度	10	1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表 3 为国家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从模型 1 的估计结果看，性别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与女性群体相比，男性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高 0.036。受教育程度对国家认同也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水平也会相对较高。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半文盲群体相比，受过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要分别高出 0.049、0.096 和 0.145。家庭收入水平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与低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要分别高出 0.018、0.029 和 0.042。社会关系同样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有亲戚在政府部门的少数民族群体比没有亲戚在政府部门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高 0.024。政治身份同样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平均比非党员群体高 0.051。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变量，模型决定系数从 0.105 升至 0.115。根据嵌套模型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25.26，自由度=1，P=0.000），模型 2 优于模型 1。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国家认同水平也相对越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认同指数平均增加 0.013。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变量，其决定系数升至 0.118。通过模型 3 和模型 2 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6.87，自由度=1，P=0.009），模型 3 优于模型 2。因此，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其国家认同指数比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平均高 0.021。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交互项，其决定系数升至 0.119。通过模型 4 和模型 3 的似然比率检验结果（卡方值=3.90，自由度=1，P=0.048），模型 4 优于模型 3。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估计为-0.009，且在 0.05 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

表 3、国家认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参照类）	国家认同指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男性（女性）	0.036*** (0.008)	0.036*** (0.008)	0.037*** (0.008)	0.036*** (0.008)
年龄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小学（文盲）	0.049*** (0.011)	0.039*** (0.011)	0.038*** (0.011)	0.037*** (0.011)
初中（文盲）	0.096*** (0.012)	0.076*** (0.013)	0.074*** (0.013)	0.073*** (0.013)
高中及以上（文盲）	0.145*** (0.016)	0.119*** (0.017)	0.114*** (0.017)	0.115*** (0.017)

中低收入（低收入）	0.018*	0.017*	0.018*	0.017*
	(0.010)	(0.010)	(0.010)	(0.010)
中等收入（低收入）	0.029***	0.025**	0.026**	0.027**
	(0.010)	(0.010)	(0.010)	(0.010)
中高收入（低收入）	0.042***	0.036***	0.036***	0.037***
	(0.013)	(0.013)	(0.013)	(0.013)
有亲戚在政府部门（没有）	0.024**	0.021*	0.022**	0.022**
	(0.011)	(0.011)	(0.011)	(0.011)
中共党员（群众）	0.051***	0.042***	0.042***	0.042***
	(0.012)	(0.012)	(0.012)	(0.012)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13***	0.012***	0.015***
		(0.003)	(0.003)	(0.003)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不使用）			0.021***	0.076***
			(0.008)	(0.029)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				-0.009**
				(0.004)
截距	0.417***	0.332***	0.328***	0.311***
	(0.019)	(0.026)	(0.026)	(0.027)
样本量	2244	2244	2244	2244
决定系数	0.105	0.115	0.118	0.11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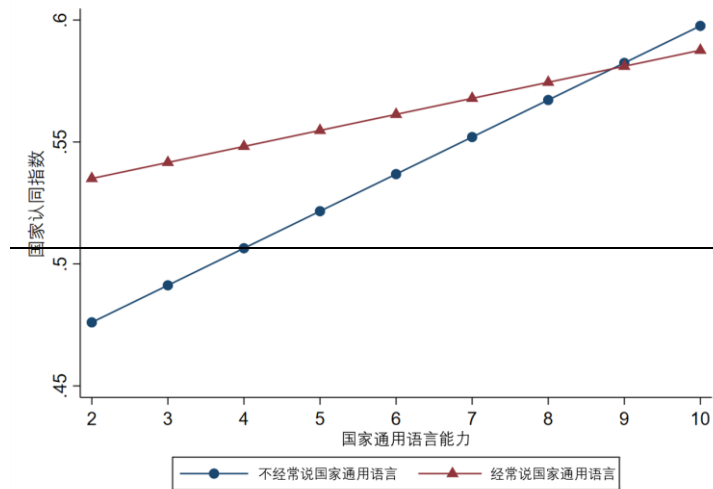


图2、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语码转换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情况

图2是根据模型4绘制的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随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其次，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较大，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显著高于不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群体，两者之间差距较大；但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在国家认同指数的差异在缩小。最后，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和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群体的国家认同指数相差不大。换句话说，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

民族群体，即使不经常说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水平也会较高。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得分为9分时，二者的国家认同指数几乎相同。

五、结论与讨论

语言不仅仅是人们沟通的工具，更是群体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一大特点。因此，深入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强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第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之间呈正相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更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以往研究认为，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其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越强，使用者发生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大^[22]。随着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逐渐超过本民族语的使用能力，便容易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本民族语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23]。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影响力和工具作用明显高于少数民族语言，拥有较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倾向于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多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年龄相对年轻、社会流动相对频繁及社会交往范围相对较广者，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也相对较多。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少数民族群体在不同情境使用不同语言并非轻而易举，它是先在自我意识基础上改变自我，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为了避免承担额外的负担，人们通常不会轻易选择改变自我，除非这种改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17]。对于少数民族群体中年龄较大者来说，重新学习新的语言已经无法使他们的生活再发生实质性的改善，而年轻人为了谋求更大发展更愿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其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即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越强，其国家认同水平越高，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在信息获得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有着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通用性。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可以拥有更广泛的信息渠道，了解更多国家整体发展的信息，产生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拥有较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体有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如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学教育。他们既可以获得更高的学历和社会阶层地位，也可以接受到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切实地体会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发展，促进其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最后，在社会身份上，少数民族群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使其具备融入主流社会生活的成员资格^[17]。语言是社会群体认同的象征，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性标识。少数民族群体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仅代表其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也代表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

第四，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水平呈正相关，他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越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国家认同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一些理论观点。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以使其获得与社会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平等充分地参与国家生活，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机会。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频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扩大其活动和社交范围，更便捷地与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和国家认同感。由此可

见，少数民族群体通过国家通用语言的频繁使用，不仅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化价值和工具性实用价值的认同，也会不断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

第五，本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关系在不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以显著提升其国家认同；但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强的群体而言，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与否对其国家认同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在增强国家认同上发挥着不同作用。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着基础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能有效增强其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对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起到辅助作用，尤其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强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如此。基于本研究发现，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高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为其创造一个经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使其获得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锻炼机会，也可以使其更深地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功能，从而增强其对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综上所述，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当前不仅要推进各级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而且要进一步创造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频率，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国家认同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心理、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本研究对国家认同测量侧重于心理和文化维度，而对政治维度测量和考察不足。因此，本研究结论不适于讨论一些与政治相关议题。其次，虽然本研究考察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体而言，其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具体情境和含义也各不相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其相互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次，关于国家认同是否会影响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使用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本研究数据来自于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 ①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本文所说“国家通用语言”指的是“普通话”，采用“国家通用语言”的称法，兼顾了实用性因素和象征性因素，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也包括海外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具有重要作用。参见王晖《论国家通用语言及其推广的“时度效”》，《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
- ②2020年9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巴特尔赴中央民族大学看望慰问各族师生的讲话。参见《巴特尔强调：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的共同责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2020，<https://news.muc.edu.cn/info/1011/18297.htm>。
- ③根据模型计算的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是一个所谓的潜变量，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关于此模型的具体介绍，可参见 R.J. D. Ayal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 焦开山，包智明. 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 民族研究，2019（4）.
- [3] 胡艳霞. 增强语言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0（4）.
- [4] 国家民委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 [5] 周庆生. 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
- [6] Gumperz, J. (Ed.) .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7] 田鹏. 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3(1) .



- [8] 张荷. 广州市外省务工人员语言态度、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 [9] 马得勇. 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J]. 世界民族, 2012(3).
- [10] 彭斌. 理解国家认同——关于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困境与实现机制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7).
- [11] McCrone, D.B., Frank. *Understanding National Identity: List of tabl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2] 高一虹, 李玉霞, 边永卫, 从结构观到建构观: 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1).
- [13] 王锋, 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4).
- [14] Harklau, L. From the “Good Kids” to the “Worst” [J]. *Tesol Quarterly*, 2000(1).
- [15] 黄行. 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3).
- [16] 王远新. 青海同仁土族的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9(5).
- [17] 叶君.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民族[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2).
- [18] 王浩宇. 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9(4).
- [19] 刘元贺. 人口流动、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国家认同——基于 2018 年新疆城乡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
- [20] 陈建伟.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选择和文化认同——以苏州回族为例[J]. 中州大学学报, 2011(6).
- [21] 武小军. 流动人口的言语接触与语言认同[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6).
- [22] 李怀宇. 浅论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转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4).
- [23] 袁焱, 许瑞娟. 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及特点研究[J]. 学术探索, 2013(5).

【编者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20 年秋季学期开设《民族社会学导论》本科选修课, 学生提交的期末作业涉及了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多个议题, 本期《通讯》选取了三篇作业, 介绍给读者。 (马戎)

【学生课程作业】

语文课本如何建构民族意识?

——对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级本科生 王朗宁

义务教育是我国公民必经的社会化过程, 对教材的学习是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实质性的核心。在课程社会学视野中, 教科书作为承载合法性知识的文本载体, 通过教师的讲授被学生吸收和内化, 从而完成社会普世知识的代际传递。然而教材文本的内容并非天经地义——“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正如斯宾塞之问¹所提示的, 教科书的编写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过程, 如劳顿 (Lawtown) 所说, 是“从一定社会的文化中选择出来的材料”²。教科书文本传达了社会规则对公民的要求, 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权力分配和主流话语; 因而我们能从教科书的结构和内容反观主流社会如何对知识进行筛选和叙述。这对观察我国民族问题的社会认识而言是一个尤其精巧的切口。

“民族 (nation)” 一词作为跨语际文化实践的产物, 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开始, 深刻影响了

¹ 杨明全: 《当代课程比较话语分析研究》,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第 77 页

² 转引自吴康宁: 《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上海教育科研》, 2002 年第 9 期, 第 4 页

我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然而由于“nation”所生长的欧洲民族主义革命语境与我国传统的族群关系之间的方枘圆凿，当近代救亡图存的抗争尘埃落后，“民族”成为了反映我国社会意识断裂的一面镜子，照见传统与现代难以弥合的分歧¹。新中国追随马列民族思想，仿效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识别”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国内众多族群（ethnic groups）划定为56个民族（nationalities），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族群身份认识的分散。改革开放之后，更多学者开始反思我国的民族政策与思想。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强调“中华民族”既是民族实体也是政治实体²。过去十几年来，民族问题的社会隐患逐渐显露，中央开始着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合所有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近代的民族建构和当代话语体系都在教科书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

对于个体而言，教科书，尤其是小学教科书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第一份“正式文本”，在民族意识的建构中有重要的作用。布迪厄的批判教育学理论认为学校和课程是文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学校教育通过产生和分配主流文化对既有的权力关系进行再生产。³教科书以外显或内隐的方式向学生传达似乎“价值中立”的基本知识，帮助学生形成对我国族群状况的感性认识。教科书建构民族意识的方式内化为读者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民族问题的方式。且由于教科书的权威性和我国多数学校的应试教育模式，这种认知形成之后便非常稳固，相对难以变更或弥补，教科书的族群知识和观念从而为社会对民族认知的整体性认知打下基底。审视教科书的民族意识表达，对理解当前我国主流话语对“民族”的建构方式和建构逻辑，反思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具有一定价值。

一、文献综述

2008年年末，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教科书中民族内容的研究开始不断涌现。过去十余年，学者对我国教材中的“民族”知识研究大多数以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为视角，聚焦于“少数民族”，关注课本中的民族文化内容是否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要求；方法上多采用内容分析，统计课本中的民族知识呈现方式和数量，并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如胡锦从文本内容、作者民族身份、人物性格、民族语言和术语、历史背景、文化风俗、插图画面七个类目进行分析⁴；类似地，王丹彤选取了选文主题、选文作者、人物品质、插图、文化风俗、课后习题六个角度⁵。

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主流课本中的民族相关内容不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标准，其中最直观的特点是“量少”。王国祥和皮琳确定了“包含民族知识”的客观标准，并以“少数民族内容占总内容的比例高于少数民族实际的人口比例”为指标评价课本的多元文化状况，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内容比例远没有达到对应的人口比例。⁶这种情况下，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呈现相对缺失⁷。另一个广受批评的特点是民族形象的刻板化。选入课本的少数民族相关作品多展现

¹ 参见马戎：《鸦片战争后新观念的进入与中国话语体系的转型》，《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213页

²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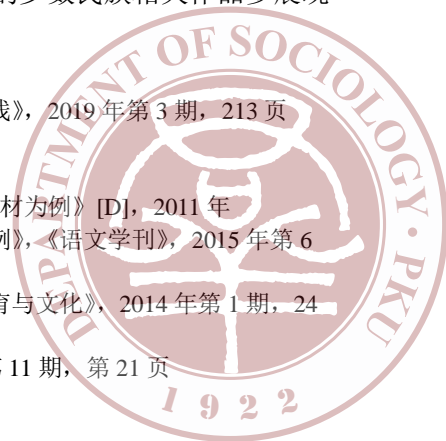
³ 杨明全：《当代课程比较话语分析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69页

⁴ 参见胡锦：《语文教科书中族群文化选择问题研究——以2007年人教版初中教材为例》[D]，2011年

⁵ 王丹彤：《浅谈小学语文教材中民族教育缺失的矫正策略——以人教版教材为例》，《语文学刊》，2015年第6期，143页

⁶ 王国祥、皮琳：《小学课本中的民族知识研究：一种多元文化视角》，《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年第1期，24页

⁷ 董珂：《初中语文教科书中“人物形象”民族状况研究》，《语文世界》，2016年第11期，第21页



生活习俗和美丽自然风光¹，往往是传统的、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人物一般都热情好客、多才多艺²；伍叶琴指出，汉族形象同样流于传统化、刻板化，这种传统化的描写已经被社会所默认³。另外选文多以汉族视角描述汉族-少数民族关系，少数民族视角缺失⁴，过于强调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单向帮助⁵。

现有的研究已经基本总结出教科书中民族相关知识在内容、分布、质量上的特点，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视角单一，集中于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落脚于教材编写原理和教学活动。二是分析比较平面，停留在表面特点，没有深入“民族”观念的历史和社会机制。三是以教材中“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很少注意到“中华民族”也是在教材中广为叙述的民族实体。仅有栗晓红的研究注意到民族意识的多重性，将民族意识区分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内部“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发现课本中的中华民族意识主要通过中国与外国对立构建，族群意识的表达强调同而弱化异。⁶但仍停留于表面特征的概括，对形塑方式的划分也有所疏漏；时过境迁，教科书中的表达也在随着政策和话语而不断流变。本文将采用建构主义视角，注意教科书中的话语争夺，对不同层次民族意识的建构进行分析。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选择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部统一编写、于2016年初审通过的“部编版”（亦称“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从2017年开始，统编版《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开始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投入使用，到2019年实现中小学各年级的全覆盖。“人教版”“苏教版”等语文教科书“有限多样性”的时代落下帷幕，部编版教科书成为建国以来最权威、使用范围最广的教科书；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社会生活、族群状况的巨大差异，对本套教材的民族意识建构应该进行更加严格和谨慎的考量。

选取统编版教科书中的语文一科，一方面因为历史、政治等科目的民族内容往往以社科知识和政治宣传的方式集中地、显性地展现⁷，从而失去了部分解读的空间。更由于语文一科在话语上的特殊性：语文教材文本中包含大量传达感性体验的、富有美学价值的内容，同时还承担培养学生表达能力的重要责任，这构成了语文教材编纂的“科学性”的一部分，相较于知识密集、客观性强的学科更能体现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争夺。⁸另外，语文教材的课文以选择、删改的形式进入，更直接地映射了“课程编制”过程的社会建构：哪些内容是“合法的”，内容是如何变成“合法的”。

与大多数前人研究仅针对教材中的课文不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教科书中的课文正文、助读系统（即课文前后的引导语、习题、补充学习）和综合性内容（每单元后的拓展性、活动内容）。除考虑到后两部分内容也包含了民族知识，更由于助读系统、综合性内容中相对直白地

¹ 李琴：《略论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选编》，《亚太教育》，2016年第26期，第92页

² 王丹彤：《浅谈小学语文教材中民族教育缺失的补正策略——以人教版教材为例》，《语文学刊》，2015年第6期，143页

³ 伍叶琴：《小学语文教材中民族文化教育元素的缺失与补证——基于多元文化视角的分析》，《教育月刊》，2012年第1期，第79页

⁴ 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201页

⁵ 王国祥：《浅析小学课本中的民族知识》[D]，2012年

⁶ 栗晓红：《汉族青少年民族意识形塑的研究——一个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的内容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7页

⁷ 栗晓红：《汉族青少年民族意识形塑的研究——一个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的内容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2页

⁸ 参见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展示了一部分话语,从而更有助于我们解读编者的意图;助读系统对于学生理解课文的引导作用,以及助读系统和正文之间的互文,也隐蔽地呈现了不同话语的斗争。

(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采用本研究主题下通常使用的质性内容分析。鉴于研究目的是对教科书中的民族建构方式进行分析,需要对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和深入考察,又由于小学教科书结构复杂,且关于民族的内容较少,且采用定量内容分析对编码方式和编码信度提出了很高的挑战,故不采用词频统计等定量内容分析方法¹。相比定量方法,质性的内容分析更有利于解读内容的真正意图等“超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²。

三、语文教科书中建构民族意识的具体内容

教科书作为课程文本存在于几个不同的场域:教育场域、社会场域和学术场域,对文本进行社会学解读,就必须注意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³场域的互动在文本中则表现为话语。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论认为,意识形态通过语言作用于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灌注使语言成为“意识形态的充盈物”,其在特定社会条件限制下的群体表现形式便是话语(discourse)。⁴社会场域的影响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存在于教科书中,体现教科书的思想性职能和意识形态色彩;学术话语是学科知识体系内知识论述的规则与定式⁵,致力于使教科书发挥其工具性职能,如让教科书的编制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使教材文本能够完成培养学生基本能力的任务等。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作为教科书中的两种基本话语,在内容体系和编排结构上都发生冲突或妥协。

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尤其当面对已经成形的固定文本,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多数互动已然无迹可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细微之处观察到彼此的进退。如部编版语文教材主编温儒敏在《语文教材编修的十二个问题》中指出,课本采用“主题单元”式的编排,是为照顾教材的“人文性”,而对于“语文性”的培养则有所不便⁶;“人文性”的结构注重有助于学生就某个特定的主题进行集中学习和体会,这便是教科书思想性职能或政治话语的发挥,但也导致了学者研究中指出的课本中民族知识“分布过于割裂”⁷的结果。课文正文和助读系统的互动同样表征了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显隐浮沉。语文教材中,除低年级识字阶段的部分内容由教科书编写者执笔之外,多数课文是编者挑选并经过删改的作家作品;作家的写作是不包含在教材编制的社会过程中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助读系统则全然受编者控制,其引导语对内涵丰富的课文的解读和侧重,便体现出对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的平衡选择。对于我国复杂的“民族”话语状况,课文和助读系统的互动可以显露出编者对不同层次民族意识建构的倾向。

我们首先对语文教科书中有关不同层次民族意识的内容作分类和展示,然后对其分布特征和话语内涵进行分析。

(一) 分类

“中华民族……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⁸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教科书中与民族相关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¹ 罗伯特·韦伯:《内容分析法导论》,李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9页

² 王郢:《教材研究导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页

³ 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⁴ 转引自段发明:《新中国“红色”课本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⁵ 同上,第10页

⁶ 温儒敏:《语文教材编修的十二个问题》,《内蒙古教育》2014年第4期,第14页

⁷ 王国祥,皮琳:《小学课本中的民族知识研究:一种多元文化视角》,《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年第1期,第26页

⁸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一个层次强调国内各个族群的“多元”，建构族群意识；另一个层次强调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实体的“一体”，建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在宏观上与中国的范围基本一致，在教科书中，中华民族意识常表现为“爱国主义”。按照这种分类方式，下表展示语文课本中两个层次内容的分布：

表 1、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着重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册数	类型	内容	助读系统有无引导性语言*
一年级上册	图片	“我是中国人”	无
一年级下册	课文	《祖国多么广大》	无
一年级下册	课文	《我多想去看看》	无
二年级下册	课文	《神州谣》	有
四年级上册	课文	古诗《出塞》	有
四年级上册	课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有
四年级上册	课文（选读）	《梅兰芳蓄须》	无
四年级上册	补充阅读	《难忘的一课》	无
四年级下册	课文（选读）	《千年梦圆在今朝》	无
四年级下册	课文	《小英雄雨来》	无
四年级下册	课文（选读）	《黄继光》	无
四年级下册	补充阅读	《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无
五年级上册	课文	《少年中国说》	有
五年级上册	课文	《圆明园的毁灭》	有
五年级上册	补充阅读	《七子之歌节选》	无
五年级上册	课文（选读）	《小岛》	无
五年级下册	课文（选读）	《梅花魂》	无
五年级下册	综合性学习	引用《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必要性》	无
五年级下册	课文	古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无
五年级下册	课文	《青山处处埋忠骨》	有
六年级上册	课文	《狼牙山五壮士》	无
六年级上册	课文	《开国大典》	无
六年级下册	补充阅读	《詹天佑》	无

表 2：部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着重展现各族群意识的内容

册数	类型	内容	助读系统中有无引导性语言*
一年级上册	图片	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孩	无
二年级上册	课文	《葡萄沟》 (《葡萄沟》插图：维吾尔族少年采摘葡萄，汉族和维吾尔族围坐谈笑)	无
二年级上册	综合性学习	蒙古族草原景色 (插图：草原、羊群、骑马的身着蒙古族服装的男孩)	无
二年级上册	课文	《难忘的泼水节》 (《难忘的泼水节》插图：裹头巾的周总理被傣族人民簇拥)	无
三年级上册	课文	《大青树下的小学》 (《大青树下的小学》插图：四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	有
五年级上册	课文	《猎人海力布》	无
六年级上册	课文	《草原》	有
六年级下册	课文（选读）	《藏戏》	无

*助读系统中的“引导性语言”，指引导学生认识和思考“中华民族”或“各少数民族”的课后习题。选读课文无助读系统，故不标注。



文学作品的内涵往往是多维度的、分散性的，课本选入的作品时有同时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各族群多样性的篇目，在此按照显性主体内容进行归类。

（二）特征分析

1. 强调中华民族意识，淡化内部族群意识建构

从表1、表2中可以发现，展示中华民族意识的篇目（23篇）远远多于展示各族群意识的篇目（8篇），教科书尤其重视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助读系统中的引导性语言分布同样佐证了这一结果：有关中华民族意识的13篇必读课文中，有6篇文章的助读系统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拓展，如：

课文多次出现了“中华不振”这个词语，查阅资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助读系统）

课文诉说了中国人的强国梦想。百年来，在强国梦想的激励下，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人物，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查找资料，读一读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杰出人物故事……（《少年中国说（节选）》助读系统）

历史上有无数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查找资料，结合这些人物的故事，说说你对“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理解。（《青山处处埋忠骨》助读系统）¹

而有关族群意识的必读课文只有5篇，其中2篇的助读系统有所引导。《大青树下的小学》在助读系统中展示了课文中提到的四个少数民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的传统服装，只有《草原》明确指导学生思考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你从课文哪些地方体会到了“蒙汉情深”？（《草原》助读系统）

其他涉及族群意识的课文，助读系统多数是“语文性”的，如：

这所学校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你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同学们在学校里做些什么？选择一个场景说一说。（《大青树下的小学》助读系统）

试着以海力布或乡亲们的口吻，讲一讲海力布劝说乡亲们赶快搬家的部分。（《猎人海力布》助读系统）

从助读系统对不同层次民族意识建构的偏重中，可见教材话语中对族群意识建构之淡化。

2. 在对族群意识的建构中强调“一体”

语文课本中涉及少数族群时，多展现族群之间，尤其是汉族-少数族群的互动；很少有只涉及单个族群的内容。《葡萄沟》以描写自然风光和葡萄加工过程为主，有一句话提及当地人民：“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难忘的泼水节》一篇描写了周总理与傣族人民共度泼水节的欢乐场景。《大青树下的小学》一文中，学校里有汉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的学生，“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一起朗读课文，一起“跳孔雀舞、摔跤、做游戏”。《草原》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作者在内蒙古受到蒙古族同胞热情接待的场景，并直白地提出“民族团结”的主题。仅有选读课文《藏戏》和民间传说改编的《猎人海力布》没有提及族群间互动。值得注意的是，“猎人海力布”是蒙古族民间传说，由蒙古族的甘珠尔札布整理，课本中的配图剪纸中有穿蒙古袍的人物；但课文文本中刻意略去了这一传说的“族群性”，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开头，没有提及故

¹引用课本内容，均来自2016年初审通过的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具体册数见表1、表2），后文不再注明

事来源的地区或具体族群。¹

3. 民族意识层次的年级差异

以一、二、三年级为低年级，四、五、六年级为高年级，课本尤其重视对高年级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建构，23篇相关文章中，有19篇分布在高年级学段；各族群意识建构的内容则相对均衡，偏向低年级学段。对应的助读系统中，“人文性”（政治话语）的引导随着年级升高、中华民族意识相关内容的增多而呈现增加的趋势；涉及各族群意识的文章后，助读系统的“语文性”（学术话语）引导较强。这一方面与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涉及民族意识建构方式的差异。

从上述分析可以见得，教科书对族群意识的建构是相当谨慎的。内容上注重描写族群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少强调单个族群的特殊性；编写上表现为相关内容的数量少，文后的助读系统并不像涉及中华民族意识时积极引导读者在族群层面进行深入思考，政治话语在此退让给学术话语。

四、语文教科书中建构民族意识的方式

（一）分类

课本中对民族意识建构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直接与间接。直接建构，在中华民族意识的层次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在族群意识层次体现为对少数民族的生活进行直接描写。间接建构²，即通过引导学生对共同体进行“想象”来建构，这里的“共同体”主要是整个中华民族。

在此首先对上述分类进行澄清。栗晓红在分析不同层次民族意识的建构时，认为课本中部分“泛泛地与爱国有关系”的内容不在分析范围之内³。而我认为这些文章恰是教科书建构民族意识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若不考虑这部分内容，就大大低估了教科书对建构中华民族意识的重视程度。

现代主流民族理论基本否认民族身份的本质性，认为民族意识更多是个体对某一社会分类的认同，民族分类更多是建构的产物。现代主义将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新现象，安德森以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了这类民族和民族主义诞生的一般性论证，认为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定程度上是以印刷品为基础、以语言为媒“想象”而成。“想象”大致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不同的方式。横向的想象基于“同时性”，即意识到同时代他人的存在以及对他人的经验的想象，这种想象方式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如报纸上带有地方性特色的事件、实际的“朝圣之旅”，都达成了“齐唱”般的共时性体验。纵向的想象是对时间和历史的再认，人们“从历史的深度之中观看古代”⁴，并将历史人物追认为自己的同胞。族群-象征主义强调记忆、历史和符号等在唤起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空间-时间框架的民族概念的创造，是基于人们对祖地、祖先的情感，以及“风景或诗意空间、历史或黄金年代”²的感召。

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想象同样是建构民族意识的重要方式，在低年级更成为培育民族感的

¹ 在网络上查阅可以发现，不同版次的《猎人海力布》的开篇有细微不同，某些以“在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开头。

² 考虑到客观性的要求，采用间接建构方式的文章未归入表1中

³ 栗晓红：《汉族青少年民族意识形塑的研究——一个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的内容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3页

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²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98页

³ 同上，第16页



主要手段。而观察课本引导学生进行共同体想象的具体方式和所使用的符号、意象，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教科书话语中隐含着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族群关系认知。由于对直接建构方式的研究通常包含在以往学者对教科书显性特征的分析中，已经较为充分，本文主要分析课本中民族意识的间接建构。

（二）分析

1. “祖国多么广大”：政治话语下的“多元一体”空间

语文课本中的横向想象总体呈现为“多元一体”的模式：各地区/各族群多姿多彩，它们都统一于祖国疆土/中华民族。这种模式的显性代表是二年级下册的课文《神州谣》：

我神州，称中华，山川美，可入画。黄河奔，长江涌，长城长，珠峰耸。
台湾岛，隔海峡，与大陆，是一家。各民族，情谊浓，齐奋发，共繁荣。

一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部分的《祖国多么广大》，和《神州谣》同为教材编写者专门为教科书撰写的文字，有相似的表现形式：

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飞舞。长江两岸，柳枝已经发芽。
海南岛上，到处盛开着鲜花。我们的祖国多么广大。

教科书展示不同地域景物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自然特征统一于广大的祖国；读者于是想象到，在祖国各处有与自己身处的环境截然不同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和自己的家乡属于一个共同体并存在联结，从而逐渐建立朴素的共同体观；由地理空间的想象自然而然产生的朦胧民族意识，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义的想象是有边界的；语文课本常常选取我国边疆为样本，使读者确证共同体的范围，并暗示民族国家（nation-state）领土的合法性与神圣意义。共同体的疆域是“‘历史性的’土地，是‘祖地’，是我们的人民的‘摇篮’”³。从这个角度理解，课本中许多文章于是不能被认作单纯的风光描绘，而是经过意识形态精心选择的结果：

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日月潭》）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是我国海南省三沙市的一部分。那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是个可爱的地方。……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可爱的西沙群岛，必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富饶的西沙群岛》）

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小兴安岭一年四季景色诱人，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也是一座巨大的宝库。（《美丽的小兴安岭》）

从以上选段，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到政治话语对写景课文的介入。其一是地点的选择，在二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两个以实地风景为主题的单元（共六篇课文）中，除《黄山奇石》外，其他五篇均选取边疆省份的风光（台湾、新疆、海南、广东、黑龙江）作为描写对象。其二是内容上对地理位置的强调，通常在开篇对风景进行中国疆域内的定位。其三是文体和语言，每篇文章都包含一定的说明性语言，对描写地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往往以国家视角出发，肯定某地区作为“祖国组成部分”的贡献或前景。若与四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模块的习作例文《七月的天山》进行对比，便能更直接地体会到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叙述模式和“语文性”写景文字之间的巨大差异。

2. “我多想去看看”：谁在看，向哪看

在建构族群意识时，语文课本的叙述表现出空间想象和族群想象的同构。一年级下册的课文



《我多想去看看》¹比较直观地展示了这种族群想象：

妈妈告诉我，沿着弯弯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爸爸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遥远的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我对爸爸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

文中北京孩子的向往新疆或许出于对奇异美景的好奇、对祖国边疆的体认愿望；而维吾尔族孩子的向往北京则是出于“向心”性质的政治朝圣。边地风景体验的民族国家想象，是政治话语影响下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一脉支流的特征。²教材中涉及族群互动的内容呈现出“中心-四方”式的凝视。其一表现在倾向于展现汉族和“聚居边地的少数民族”的互动，如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藏族，没有课文提及满族、回族等广泛与汉族杂居的族群生活。内容方面，《葡萄沟》《难忘的泼水节》《草原》中的族群互动都是少数民族动员当地特色资源，对客人进行热情迎接。《难忘的泼水节》中的客人是周总理，《草原》中客人是作者老舍³，《葡萄沟》中的客人则是模糊的“你”，实际指教科书读者中的大多数——汉族学生。在“中心-四方”族群关系的视域下，丰富的族群互动关系在课本中坍塌为教科书中“边地少数民族迎接远客”的图景：

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葡萄沟》）

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一条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升上天空。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了！”（《难忘的泼水节》）

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汽车走了一百五十里，才到达目的地。一百五十里，全是草原，再走一百五十里，也还是草原。……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草原》）

课文往往着重描写少数民族的热烈反应，这种“援助与感恩”⁴图景是以“中心”为视点，为汉族读者构建的符号化的“民族团结”想象，其现实基础则是区域自治制度对族群的地理区隔。教科书读者的“理想型”是居于“中心”的多数族群，而非“四方”的少数民族，这更清晰地表现在对古诗文的选择中：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南宋·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王昌龄《出塞》）

在我国古代的华夷秩序中，“夷”常常面目模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分得清大概方向；传统中国社会实际并没有制度化的族群身份界限，夷夏之辨以文野之分为基础，且居于中心的华夏有“用夏变夷”的大同理想，夷夏身份并不是绝对的⁵。上述两首诗中士大夫面对的敌人并非同一族群，但都以“胡”的面貌出现。教科书的本意是在古代语境下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胡”的具体族群身份并不重要，因而不考虑北方边疆族群的感受。由于古今“民族”和“国家”概念的差异，部分古诗中呈现的族群对抗和今日的“民族团结”话语发生了龃龉。此种细微的矛盾事

¹ 配图为穿着维吾尔族服装的男孩遥望天安门，北京男孩遥望天山

² 参见马绍玺：《边地风景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国家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120页

³ 老舍是满族人，但课文中没有提及。

⁴ 参见王国祥，皮琳：《小学课本中的民族知识研究：一种多元文化视角》，《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年第1期，第25页；马戎：《超越“援助与感恩”》，《南风窗》，2010年第10期，第16页

⁵ 马戎：《中国文化与政治交往史中的“蛮夷”“入主中原”》，《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168页

实上揭示了语文课本中“看”的主体是居于“中心”的汉族，“看”是向四方各个族群看；教科书中的少数民族成为被观看的客体。“中心-四方”视角是历史性的：从《禹贡》中以王畿为中心、以五百里为单位划分的“甸、侯、绥、要、荒”的虚拟空间层级¹，到儒家礼制中的“五服”，都带有单向的想象和等级色彩。

3. 民族意识建构方式的年级差异

适应于学生的心智发展，民族意识建构的方式也有高低年级的差异。“想象”作为一种感性的、模糊的建构方式，相对集中于低年级的教科书文本中。直接建构，尤其是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有关的内容，则主要分布在高年级；通过分辨“他群”而认识“我群”，是民族意识和情感生发的重要途径。教材对中华民族意识进行建构的23篇文章中，有11篇是对中外对抗的明示或暗示，“他群”包括近代的帝国主义、抗战时期的日本、抗美援朝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课文多展现国难当头的民族危机、英雄人物的奉献精神，以唤起读者的中华民族意识。

五、总结、建议与不足

在两个层次的民族意识中，现行的部编版小学语文课本突出中华民族意识，形成了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在内容上、形式上循序渐进的完整体系：用地理空间想象、族群想象建构“多元一体”意识，进一步以展现民族国家冲突的方式激发爱国情感。

与前人研究进行纵向比较发现，近十几年，主流小学语文教科书对族群意识的建构逐渐弱化。表现为相关文章数量的减少、助读系统中政治话语的退让以及族群视角的单一化。“中心-四方”的族群关系凝视将丰富立体的族群互动抽象化、扁平化，少数民族在教科书中成为接受凝视的客体。我国族群关系的特点也比较清晰地反映在课本民族意识建构的方式中。对中华民族意识的建构，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表现中外的历史对抗激发民族意识；对内部多族群日常互动的正面描写，则缺少去中心化的视角、缺乏超越“援助与感恩”的模式，而更多以“想象”的间接建构方式将“民族团结”符号化和抽象化。所谓“认同”，重点在“同”字；“民族”这一社会分类的强大力量，部分源于人们在共同生活的经验中彼此熟习，从内心自然生发出情感的联结。我国目前客观上存在系统性的“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³，导致了族群之间不仅是空间的、制度的区隔，更是文化的、经验的陌生。课本涉及族群时，仍然以区域自治的观念选择描写对象、取舍叙述内容，根源于国内各族群之间仍然缺乏深度的互动。

以话语视角观之，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交锋在不同层次的民族意识中有不同的表现；政治话语在中华民族意识建构中更加积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意味着教科书中的政治话语要在族群意识的建构中沉默，而应以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方式引导学生正视和重视族群关系。此外，过多的意识形态介入造成风景体验的政治化；这种倾向在低年级阶段由编者撰写的文章中尤其明显。为了使得教科书内容达到政治话语的要求，又受到读者理解能力、文章篇幅的限制，编者不得不以简单的语言传达复杂的内容，部分“美文”越来越多地具有“实文”的特征，以致出现如《神州谣》般贴近政治宣传的低年级课文。不同层次民族意识的构建，在内容的分配、方法的使用以及助读系统的引导上还可以得到更加科学的安排，以达到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平衡、教材的“语文性”和“人文性”的平衡。

限于研究主题，本文在分析的客观性上可能有所不足。尽管部分是质性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方法本身的要求，但本文仍然还有标准化的余地；建构方式的划分带有尝试性，还有部分模糊之处，需要进一步谨慎思考。

¹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³ 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95页



【学生课程作业】

民族建构、现代化与泰国南部穆斯林教育的变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7 级本科生 宋文思

本文的背景是泰国南部（以后简称泰南）的叛乱（Insurgency）。首先，泰国南部主要指最南端的北大年府（Pattani）、陶公府（Narathiwat）和也拉府（Yala）。这地区 80%的居民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是马来族，讲马来语¹（口音与马来西亚的官方马来语不同，而且泰南穆斯林的马来语是用爪夷文（Jawi）书写的），这与大多数泰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泰国官方媒体往往称他们为泰国穆斯林而不是泰国马来族。15 世纪以来，泰南曾经是辉煌的北大年苏丹王国（Sultanate of Patani）²，1902 年正式被暹罗王国吞并。而且后来根据 1909 年《英国-曼谷条约》，该王国被一分为二：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交给英国，其余归暹罗（今泰国）管辖。³这样，原属于一个“民族”的人就被国界线区隔开来，变成了跨境族群。从那以来，该地区一直爆发武装冲突，至今尚未结束。由于本文不以叛乱本身为讨论对象而是着重讨论该地区穆斯林的教育方面，关于其政治、经济成因以及事件的进程就不再赘述。

一、构造文化上的“民族”：禁用马来语教学

首先笔者将阐述自己对民族的理解。民族有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内涵。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民族不一定完全相吻合的。政治上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具有统一性、同质性。即尽管是联邦制但是仍然有中央政府（联邦政府）统辖全局，文化上的民族则不同。文化上的民族可以是多元的、异质性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但是文化上的“中华民族”是 56 个民族⁴文化相互交织的产物。不过，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虽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民族建构的成功将促进政治民族的巩固，因为这会增强民族国家的人民的国家意识。打个比方，笔者认为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分别类似房子（House）和家（Home）。建立政治民族就像造个房子，然后把人安置进去。如果成功建立文化民族了，房子里的人会有这样的意识：“这是我的家，我不愿意离开”，换言之文化民族就是维护政治民族的感情纽带。

20 世纪初，暹罗王国深深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逼迫。于是泰王拉玛五世启动中央集权的进程，1902 年把北大年苏丹王国归入暹罗版图并使之成为一个邦就是其中一个表现。泰国成功躲过殖民主义的爪牙，这样“房子”就盖起来了。

进入 30 年代，中央政府开始构造文化上的“民族”以巩固统一意识，于是加大了对泰南穆斯林生活的控制。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要成功建立文化民族即建立一个对所有族群都有感召力的民族就应该把各族群的文化吸纳进去，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文化层面上有一席之地。然而当时的泰国政治精英似乎不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政治民族就应该对应同质性的文化民族。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就奉行“同化政策”，打造出以泰语、南传佛教和国王为特征的“泰国文化”⁵，非三者就不是泰国人。同化政策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 1921 年《义务教育法案》规定所有儿

¹ Aurel Croissant and Christoph Trinn, eds., *Culture,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09, p.22.

² Pattani 和 Patani 分别是泰语音译和马来语的写法。

³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uthern Thailand: Insurgency, not Jihad*, Brussel, 2005, p.2.

⁴ 按照中文的使用习惯。个人认为称之为族群更加合适。

⁵ Aurel Croissant and Christoph Trinn, eds., *Culture,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09, p.25.



童必须进入公立小学接受泰国语言与文化的教育。而且关闭了传统学校“波诺（Pondok）”。¹波诺有传授伊斯兰教伦理和讲授马来语与阿拉伯语的功能，对塑造马来人同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些举措难免招致父母的不满。30年代末銮披汶政府泛泰主义政策（Pan-Thai policy（Ratthaniyom））对穆斯林生活的干涉更加严重。他们不许讲马来语、穿马来式服装、公务员必须改用泰语名字、停止履行伊斯兰教的家庭和财产法律等待。銮披汶还把佛教元素施加在泰南穆斯林身上比如迫使学生在学校里的佛像以表示对国家的效忠。²

对于泰南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是他们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坚守他们的信仰又使他们不符合“泰国人的标准”。可见，这样的文化上民族建构使马来族和泰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可共存。同化政策导致泰南穆斯林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他们的“家”，因为他们住在这里感到不自在。于是有的想离开，有的想改造，有的甚至想破坏整个结构从而能分出来建造自己的房子。基于此，泰南穆斯林与国家的矛盾就逐渐升温。

二、国家对泰南穆斯林的让步和传统与现代化的妥协： 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

中央政府仍然不放宽对泰南穆斯林教育的控制，因为中央认为波诺学校是极端主义的摇篮。因此政府于1961年推出“教育促进计划”，以将波诺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政府承认波诺的存在，但是必须跟官方注册并受政府监督。1964年政府甚至规定所有注册的波诺使用泰语讲授，可是这些政策的结果并不理想。³父母不放心让他们的孩子去这些不使用马来语的波诺上学，因为他们担心马来认同会被淡化。

对此，泰国教育部于70年代开始设立伊斯兰私立学校。这类学校结合了世俗和宗教教育：早上和晚上安排宗教教育并讲授马来语和阿拉伯语，下午采用泰语讲授非宗教课程。此类学校日益受欢迎。⁴笔者认为政府这一举措具有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一方面，这是中央政府对泰南穆斯林在宗教和马来语教育上的需求的妥协，体现了政府相比过去更加宽容的态度。此时国家所建构的文化上的民族比过去更有灵活，能够允许马来族传承他们的文化并保留其身份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泰南穆斯林的国家认同，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该政策的进步意义在于伊斯兰势力学校实现了传统（宗教和马来语教育）和现代化（非宗教科目和泰语教育）的结合。虽然伊斯兰教和马来语是泰南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要参与泰国的现代化进程⁵并从其中获益就不能缺乏世俗知识（比如数理化、英语）和使用泰语交流的能力。比如如果一个泰南穆斯林青年想到其他旅游业更发达的南方各府去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他就必须掌握泰语否则不能跟雇主、同事或者顾客沟通。因此伊斯兰私立学校在客观上给泰南穆斯林带来改变生活状况的机会，从而既能够保留马来族的文化又能增加泰南穆斯林的社会流动性。从保守穆斯林父母的角度来看，伊斯兰私立学校的宗教色彩显然没有传统波诺学校的浓厚，可是这也换来他们子女更多的谋生、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技能。因此他们也决定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进行妥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伊斯兰私立学校。

此外，泰国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RILCA) at Mahidol University）开展的双语教育项目也是泰南穆斯林教育的另一个里程碑。

¹ 施雪琴：《嬗变中的东南亚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23页。

²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uthern Thailand: Insurgency, not Jihad*, Brussel, 2005, p.3.

³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20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2011年3期，第23页。

⁴ 同上

⁵ 泰南穆斯林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



该项目于 2007 年在 4 所试点公立学校开启，旨在提高泰南穆斯林儿童学习泰语的能力。双语教育项目时长 9 年从幼儿园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教师使用马来语教泰语直至小学三年级泰语逐渐成为主要授课语言，其中用泰国文字写马来语。同时小学二年级学生将开始学习英语，三年级设有“马来学”课程讲授当地文化、文学以及官方马来语¹（爪夷文和罗马文字皆有）。²研究表明参与该项目的学生的泰语水平以及国家测验（O-Net）成绩均比普通学校高³。这是因为孩子们初步学习泰语时还有母语的帮助，所以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从而学习起来更愉快，效果就更好。⁴

笔者认为双语教育项目又是一次传统与现代化的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体现是教师使用泰国文字写马来语。这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马来族传统的传承，使用爪夷文写马来语肯定是最正宗的，但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爪夷文的工具性日益减弱。新一代泰南穆斯林要想拓展发展空间，在其他非农业行业或者在其他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泰语能力是必备的。因此与伊斯兰私立学校同样的道理，泰南穆斯林难以避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需要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进行一定的取舍。虽然泰语能力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以马来语能力的下降为代价，但是这也换来泰南穆斯林改善社会状况更大的机会，从而改变他们相对被边缘化的局面。比如说如果他们掌握了泰语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参政，在会议上代表泰南穆斯林发出声音，引起社会舆论。泰南穆斯林精英在政坛上的数量越多，他们的力量就越大。这反过来或许有利于谋求更大的自治权或者进一步争取国家对他们的文化的保护与肯定。

三、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对哈吉·苏龙的回应与泰南穆斯林教育的改善

在泰南穆斯林争取国家对他们文化风俗的包容的斗争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哈吉·苏龙（Haji Sulong）。他于 1947 年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七点要求”，其中一条涉及到教育即第三条：必须以马来语为小学的教学语言。⁵笔者认为考虑到同化政策给泰南穆斯林带来的压力，他的请求是有道理的。可是从现代化以及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他的请求会限制泰南穆斯林自身的发展。从中学开始学泰语显然太晚，这几年的差距会使他们在获取世俗的知识（尤其数理化）乃至升学上遇到更大的困难。因为用爪夷文写的现代读物数量非常有限，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是用泰语授课的。仅仅掌握马来语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发展空间局限在泰南地区（因为马来西亚也不使用爪夷文了），同时局限在农业（因为其他行业对泰语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兼用马来语和泰语作为小学教学语言是更合理的需求，而且或许更能得到当时政府的批准。

回到当下，笔者认为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各有优点，对泰南穆斯林的整体发展都有帮助。不过基于现有的资料，笔者的理解是两种教育之间仍然有隔阂即双语教育项目只在极少数公立学校中开展。这就造成了困境因为公立学校不开设宗教课程，相当于如果想更好地掌握泰语就要放弃宗教科目。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泰南穆斯林教育的质量同时保留他们的文化，教育部应该将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结合在一起：以伊斯兰私立学校为基础，把双语教育项目嵌入进去即在低年级用马来语教泰语。这样的安排有好处就是孩子们不需要用周末的时间去补宗教课，减少了他们学习的负担。另一方面，父母也不会担心孩子用泰国文字学马来语了会对爪夷文和阿

¹ 指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

² [泰] 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往美好的未来的桥梁：泰南的双语教育项目》，2018 年，第 9 页。

³ 指全程使用泰语给穆斯林儿童授课的学校

⁴ [泰] 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往美好的未来的桥梁：泰南的双语教育项目》，2018 年，第 3 页。

⁵ [泰] Putthapol Mongkolworrawan：《关于哈吉·苏龙“七点要求”的一些事实》，《宋卡王子大学学报》2009 年 3 期，第 15、22 页。



拉伯文感到陌生，因为孩子们在上午的宗教课都会接触到这些文字。总之，笔者认为将双语教育纳入伊斯兰私立学校的框架会使泰南穆斯林教育得到改善。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同时对国家更加认同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泰国人身份能够并存。

不过，从民族建构方面来看，仅仅改善泰南穆斯林教育以配合他们文化的传承是不够的。非穆斯林的教育也应该为此做出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不仅要鼓励泰南穆斯林学习泰语，国家也应该鼓励非泰南穆斯林的泰国人学习马来语。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泰南非穆斯林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以马来语课的成绩为申请大学的加分项目。这些学生掌握了马来语就可以跟穆斯林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改善族群间的关系。从泰国的学术和职业测验（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Aptitude Test, PAT）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泰国教育对马来语的重视显然不够。PAT 测验是大多数学生报考大学需要参加的，其中 PAT7 是语言能力测验。目前 PAT7 有法、德、日、汉、阿拉伯、巴利和韩七种语言。巴利文的工具性实际上比马来语还要低因为只用于佛教经典教学，然而仍能够作为一个测验项目。因此为了体现国家对泰南穆斯林语言文化的包容以及鼓励更多人来学习，笔者认为教育部应该考虑在 PAT 测验中增加马来语。

结语

泰南穆斯林的教育的发展过程相当曲折：从 30 年代遭到同化政策的压迫，到 70 年代宗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再到 21 世纪双语教育的出现。背后的推动力是民族建构和现代化进程。起初中央的政治精英想建立同质性的文化上的民族，所以排斥他们视为“非泰国”的元素，导致马来语在泰南穆斯林教育中被禁用而且不少波诺学校被关闭。后来由于遭到泰南穆斯林坚强的抵抗，中央政府逐渐改变对建构民族的态度，从强迫同化到包容对待他们的文化。因此出现了结合宗教和世俗教育的伊斯兰私立学校以及双语教育项目。必须承认，这一变化使泰南穆斯林教育与马来传统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泰南穆斯林之所以接受这些变化，是因为现代化的需要使他们意识到获得世俗知识和学习泰语的重要性。如果不具备两者，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将受到限制。这样国家与泰南穆斯林、传统与现代化就在教育上达成了妥协并塑造出现行的教育。

为了深化民族的建构和进一步提高泰南穆斯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能力，中央政府应当结合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项目。同时推广对非穆斯林学生的马来语教育以促进族群间的交流，改善他们的关系，从而为解决泰南叛乱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6-394 页。
-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20 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2011 年 3 期，第 20-25 页。
- 李一平、吴向红：《冷战后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原因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7 年 3 期，第 39-49 页。
- 马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第 11-17 页。
- 马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 年第 3 期，第 136-156 页。
- 施雪琴：《嬗变中的东南亚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21-26 页。
- Aurel Croissant and Christoph Trinn, eds., *Culture,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09.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uthern Thailand: Insurgency, not Jihad*, Brussel, 2005.
- [泰] Putthapol Mongkolworrawan: 《关于哈吉·苏龙“七点要求”的一些事实》，《宋卡王子大学学报》2009 年 3 期，第 15-27 页。
- [泰] Suwilai Premrirat: 《双语教育（泰语-马来语）项目的进程》，《研究社》2009 年 4 期，第 11-15 页。
- [泰] 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往美好的未来的桥梁：泰南的双语教育项目》，2018 年。



【学生课程作业】

浅析新加坡语境中的“华人特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7级本科生 梁诗慧

摘要：2019年的“褐脸”风波使新加坡舆论界再次兴起对“华人特权”的讨论。新加坡“华人特权”在没有类似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拥有特定的蕴涵，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加坡语境中的“华人特权”是关键任务。“华人特权”并非是在偏向任何族群而出现的一种现象，他仅仅是华族作为大多数群体所形成的客观且自然的优势。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应在“华人特权”是否存在，而是如何解决和引导华裔群体正视他们的“华人特权”，进而推动族群关系的进步。

关键词：华人特权；族群关系；新加坡；褐脸

一、引言

2019年7月末，新加坡星网电子付款公司（NETS）刊登了一则具有争议性的广告。为了传达“电子支付适用于每个人”的理念，身为华裔的广告代言人周重庆需饰演新加坡的四大种族。为了扮演少数民族，他将肤色涂为深色（见图1）的行为引起热议。辩解者的解释是广告并无意取笑马来或印度同胞，但批评者则认为广告商若想传达宣传理念，可以聘请其他种族作为代言人，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表示，用“褐脸”（brown-face）达到综艺效果的意图与历史上白人通过“涂黑脸”（black-face）扮演黑人以获得娱乐的行为是同质的，这都是将少数群体非人格化的歧视性举动。因为类似的事件出现不只一次，有少数民族同胞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失望与无奈，认为华裔群体的优势地位赋予他们定义玩笑边界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常用“无恶意的玩笑”合法化自己的行为，漠视少数民族的感受，而少数民族表示不满就会被看作是过于敏感¹。新加坡一对印度族兄妹Preeti Nair和Subhas Nair 网红则通过一段说唱表示他们的不满，指责华族总是“搞砸了”，目的是要批评华族所拥有的“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因影片内容含有激进且具有煽动性言论，这对兄妹已受到警方严厉警告，该影片也已下架。



图1: 具有争议性的电子支付广告（来源：Today Online²）

¹ Alfian1 Alfian Sa'at, 31 July, 2019, <https://www.facebook.com/alfiansaat/posts/10156608389667371>, 2020-12-30.

² Today Online, "Parties behind 'brownface' Nets ad given stern reminder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acial sensitivities:"

这则广告风波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于处理族群关系依然需要改进，其争论的所引发的批评者和辩解者也影射了民间对于族群关系，特别是“华人特权”话题还未达到共识。笔者也希望借此通过解构这场风波频频出现的“华人特权”，探讨其背后的内涵与意义，为日后开启和拓展有关议题做出贡献。

二、“华人特权”概念的来源与含义

近年来“华人特权”使用更广泛，但也因此使之模糊化。但是，对“华人特权”有明确的定义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讨论新加坡的族群关系。

新加坡舆论界真正出现“华人特权”是在2015年由社会活动家（social activist）Sangeetha Thanapal 创造的词汇。Thanapal 的灵感来自于 Bell Hooks 的 *Beloved Community: A World without Racism*，她发现若将书中含有“白人”的句子替换为“新加坡华族”时依然能够正确描绘新加坡种族关系的情况¹，因此“华人特权”这一词汇开始流传。

需注意的是，Thanapal 认为的“华人特权”是有歧视性质的，她认为“华人特权”是新加坡人华人主义至上（Chinese supremacy）意识形态驱使下给予华人的特权。但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的特权和种族歧视行为或态度（racism）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是可以相互独立的概念²。换言之，新加坡可以在没有明确偏向任何族群的态度或意识形态下，依然出现华人特权。

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借助Peggy McIntosh“白人特权”概念更有助于正确理解新加坡的“华人特权”。McIntosh 表示，“白人特权”是白人因自己的肤色不自觉（oblivious）地获得一些不可见（invisible）且不劳而获（unearned）的特权、专权和优势³。由此可见，McIntosh 版本的“白人特权”重点在于其隐蔽性，与法律上赋予群体的可视优惠待遇或宪法偏向特定族群有所区别。因为这些优势对于优势群体过于理所当然，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特权存有盲点。为了证明这一点，McIntosh 重新审视她日常生活的审视，并写下了二十六条她作为优势群体（白人）所享受曾未察觉的优势。这比如有“如果我需要搬家，我非常肯定我能够租或购买我能够承担且我想住的地址的房子”“我从来不需要代表我所属的族群来说话”⁴。

同样的，在强调种族平等的新加坡里，华族也有他们天然但是他们却不知的特权，其经典例子是2017年10月李秀萍博士向《海峡时报》社论投稿事件。在她的稿件中，她表示在新加坡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种族歧视现象——新加坡店员在招待她的时候摆了一副臭脸，而对她的白人丈夫却热情款待，因此她对新加坡开始出现种族歧视现象感到担忧⁵。很多少数族群表示李博士所遭遇的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李博士却大做文章，足以证明她的“华人特权”。

三、种族平等原则下的“华人特权”

IMDA”, August 14, 2019,

<https://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parties-behind-brownface-netsad-given-stern-reminder-paying-attention-racial>, 2020-12-30.

¹ Adeline Koh, “Chinese Privilege,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ity in Singapor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deline Koh and Sangeetha Thanapal”, March 4, 2015, <http://www.boundary2.org/2015/03/chinese-privilege-genderand-intersectionality-in-singapore-a-conversation-between-adeline-koh-and-sangeetha-thanapal/>, 2020-1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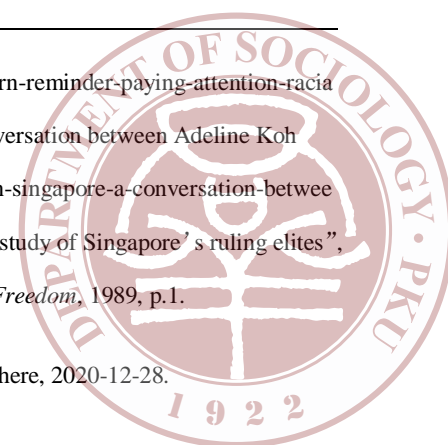
² Humairah Zainal & Walid Jumblatt Abdullah, “Chinese privilege i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s ruling elites”, *Asian Ethnicity*, 2019, p. 2.

³ Peggy McIntosh, “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Peace and Freedom*, 1989, p.1.

⁴ *Ibid.*, p. 2.

⁵ Lee Siew Peng, “When did race become an issue here?” Oct 4, 201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forum/letters-in-print/when-did-race-become-an-issue-here>, 2020-12-28.



“华人特权”是从美国语境中演变的一个概念，但是新加坡即没有经历过如同美国的奴隶制度和漫长的黑人解放和民权运动，宪法上也没有给予任何一个族群特殊的权利或权力，因此有必要探讨新加坡出现“华人特权”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

新加坡从建国以来非常坚持种族平等原则——1964年和1969年爆发的种族冲突¹加上李光耀先生的个人治国理念奠基了新加坡建国之路将建立在任人唯贤（meritocracy）和种族平等核心价值观之上。这两个核心原则也决定了新加坡的种族政策的基轴：第一，不采用肯定性政策；第二，强调多元文化主义，采取的种族群大拼盘（ethnic mosaic model）模式。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面对的一大问题是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政策下，马来族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较少²，导致了马来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比华族或印度族来得较低——1966年，马来族的平均月收入是187新币，而华族和印度族分别是223新币和256新币³。但是新加坡并没有采纳和类似于美国的肯定性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或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新加坡政府通过自助族群资助团体（如MENDAKI）让族群自发协助族群的成员。这是政府通过间接方式确保各个族群获得平等竞争的权利而不是直接依靠政府援助⁴，是一种平等任人唯贤（fair meritocracy）⁵的形式。

另外，新加坡采取的是种族整合模式，目的是让不同的种族为新加坡文化添加专属色彩。以戈登族群发展关系的“三阶段理论”⁶为参照点，华族虽然在新加坡占大多数，但新加坡并没有采用第一阶段的以华族或其他族群的文化为主要的文化导向、或是要求四大种族“摆脱原有民背景和文化束缚”⁷的同化政策，而是采用与第三阶段相似的政策，让四大族群的文化相互融合。因为如此，新加坡人制定了四大种族（CMIO）辨别的政策：新加坡人的身份证会被标记自己的族裔身份，新加坡四个官方语言也是四大族群语言，政府组屋也需要有四大种族，集选区的也需要有四大族群的代表。

然而，这样的形式上平等依然会出现“华人特权”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出在于华族占新加坡社会构造的大多数，是数量上形成的自然优势（majoritarian privilege）。数量上占多数能够给予人们安全感（safety in numbers），而且社会通常会有迎合大基数的惯性⁸。这种数量上的优势是社会自然的构造与生俱来的，虽然造成的结果具有种族歧视性质，但当华人特权被发挥的同时并非华族刻意压迫少数群体的结果。

如同白人特权，新加坡“华人特权”的体现非常微妙，作为华裔族群难以察觉。一个例子是差别待遇。身为主体族群的华裔因人数相对多，受到歧视和差别待遇可能性低，但少数族群就会面对华裔所未承受的压力。2018年数据显示，在工作岗位上，仅有8.5%的华裔受到了差别待遇，与印度族的22.6%和马来族的25.7%形成强烈对比⁹。

¹ Lily Kong, Brenda S.A. Yeo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and Spectacle: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Day Parades in Singapor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6, No.3, 1997, p.213.

² Eng Fong Pa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Malay Muslim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 No.2, 1981, p.150.

³ *Ibid.*, p.152.

⁴ R. Quinn Moore, “Multiracialism and Meritocracy: Singapore’s Approach to Race and Inequalit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8, No.3, 2000, p.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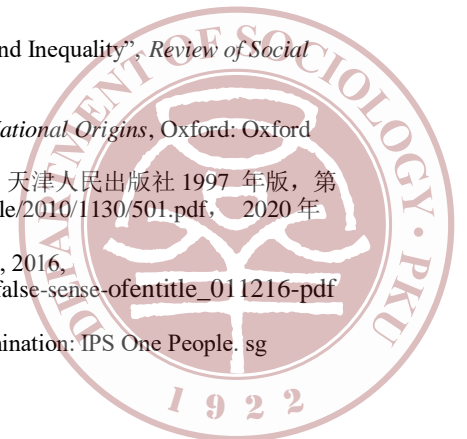
⁵ *Ibid.*, p.339.

⁶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⁷ G·辛普森著：《民族同化》，载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转引自周娟：《多元同化刍议》，<https://www.sinoss.net/qikan/uploadfile/2010/1130/501.pdf>，2020年12月30日。

⁸ Eugene Teng, “Majority race must be wary of false sense of entitlement”, December, 2016,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td_majority-race-must-be-wary-of-false-sense-of-entitlement_011216-pdf.pdf?sfvrsn=77739f0b_0_2020-12-30.

⁹ The Straits Times, “Slight increase in racial minorities perceiv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IPS One People. sg survey”, Jul 30, 2010,



另一个例子是在新加坡在80年代后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和推进儒家思想教育的政策。1982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实行《儒家伦理》课程，1985年出版《儒家伦理教材》，是世界上首个将儒家伦理作为教学内容的国家¹。为了配合强化儒家精神的措施，当时的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出台“讲华语政策”，并在1979年宣布出台特选学校政策，将资源投入在培养精通中英文的人才。儒家文化显然是新加坡华裔群体的文化特点，虽然儒家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且在出台政策也与不同族裔领袖讨论并征得同意，但是少数族群是否能够与不属于他们自己文化背景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联系值得深思²。

在这一点上，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主要是华裔，他们集体的特别是华族优越感使这种看似有种族偏向的政策和价值观得以推行³，少数民族则只有被动地融入到华族的主体文化中。然而，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熟知新加坡的治国理念就能明白，新加坡看似偏向华族的政策实际上是以国家利益为主要考量，在特定情势发挥族群文化的优势（situational ethnicity）以将国家利益最大化⁴。放眼于80年代的国际政治背景，新加坡推行这样的政策是具有极大的实用主义而非族群优越感在作祟。当时的西方国家正以散播民主制度和人权问题为理由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新加坡对外强调“亚洲价值观”，目的就是向西方国家证明世界上可行的政治制度非常多元，希望击退他们的干涉主义⁵，对内则是给予父权统治的合法性⁶。而且，新加坡加强华语教育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正在崛起的历史节点上，新加坡在中文教育工作远远不足，可能面临缺乏与中国联系的人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实际上正在试图补救基础薄弱的华人文化，而不是继续加强已经非常强盛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在国家发展和处理种族关系间权衡利弊做出的一个取舍，即使它并非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图，且在推出后政府也小心翼翼地处理其他族群的关系，但它的顺利推出且能够不引起大规模的反弹，客观证实了华人作为大多数群体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少数民族的话语空间。

最后一个值得举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自1989年颁布的居民种族比例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同一个族群因为拥有相同的生活习惯、语言和文化，若有选择的权力，他们会选择和自己的族群居住在一起。为了打破这种惯性，EIP目的是强制性地确保新加坡四大种族在同一个社区里生活，防止不利于促进种族融合的种族聚居地（racial enclaves）再次出现。

组屋和社区的配额是根据新加坡人口总数种族的占比，因为华族占大约76%的总人口，所以一座组屋华裔人口最高比例可以达到87%，马来族则是25%，印度族和其他则是15%⁷。但这项措施也带来非预期、具有歧视性的后果：因为组屋和社区的种族配额是固定的，所以居民只能转售给自己的族群，但是因为印度和马来同胞是少数族群，他们的市场较小，他们通常得降低价格以吸引买家。有学者的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族群出售组屋的价格与华族相比相差至少3%到5%⁸。从这里可以看出华族在数量上占的优势如何负面地影响了少数族群。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light-increase-in-racialminorities-perceiving-workplace-discrimination-ips-survey>, 2020-12-30.

¹ 陈冬霞：《新加坡与韩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启示》，2004年8月29日，<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9>，2020年12月28日。

²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2003, p. 766.

³ Michael d. Barr, Zlatko Skrbis, *Constructing Singapore Eli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 p.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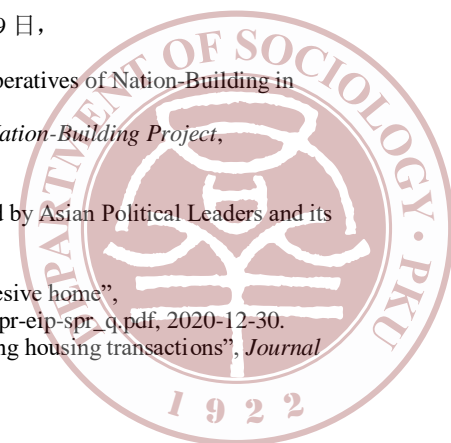
⁴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p. 752.

⁵ Chang Yau Hoon, “Re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Argument used by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s Validity”,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32, No.2, 2004, p.155.

⁶ *Ibid.*, p. 157.

⁷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Policy Changes to support an inclusive and cohesive home”,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312010/press_release-sc_spr-eip-spr_q.pdf, 2020-12-30.

⁸ Maily Wong, “Estimating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ethnic quotas in Singapore using housing transa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15, 2014, p. 132.



有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族群比华族更认为作为主体种族更具有优势¹，上述所阐述的例子一定程度上促成少数族群形成这样的观点。因此无论是外部的政策环境还是国内政策的影响，新加坡的一些政策并没有引起华族的不适或不方便，但却间接对少数民族形成压力，这代表了华人特权的客观存在。

四、承认“华人特权”的困难所在

目前在新加坡舆论上即有出现“华人特权”的支持者，也有“华人特权”的反对者。后者认为“华人特权”支持者放大了政府偏向华族的政策和言行举止，却忽视了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确保种族平等方面的努力²。目前在舆论界双方争论不休，讨论停滞不前。笔者已在上文证明新加坡华族因在数量上的优势给予了一些制度性的优势，这是社会群体构造所造成自然且客观的事实，继续在这事实上争论没有意义。归根揭底，引起这争论更深次原因在于一部分华裔难以接受“华人特权”这一说法，因此只有让他们正视这一问题，才能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华裔群体难以承认“华人特权”有两个主要原因：对特权的错误理解。表面上的意思会让华裔群体他们拥有在生活上的一些特别待遇，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同身受，所以自然而然会排斥这样的说法。这白人特权一样——身处于低收入家庭、生活窘迫的白人反射性地拒绝了“白人特权”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肤色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³。同样的，和低收入华裔群体说他们有“华人特权”也会遭到一样的反应。

其次，新加坡华裔对“特权”非常敏感。新加坡人自小接受国民教育，知道新加坡对种族和平的重视，了解种族和谐对国家生存的重要性、歧视少数族群破坏种族和谐的严重性和任人唯贤的不二法则。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种族课题变得非常敏感，加上华裔群体大多数没有遭受歧视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华裔群体不愿意去参与敏感话题的讨论，选择沉浸相信新加坡存在种族平等的美好状态。所以，突然指责他们拥有特权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压力（racial stress），这形同于指责他们是歧视少数民族的“不道德”群体，也是挑战了新加坡任人唯贤制度的罪魁祸首，和“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⁴现象一样，在面对这样的种族压力下，他们不知所措，并会呈现出愤怒和防御性的姿态以驳斥这样的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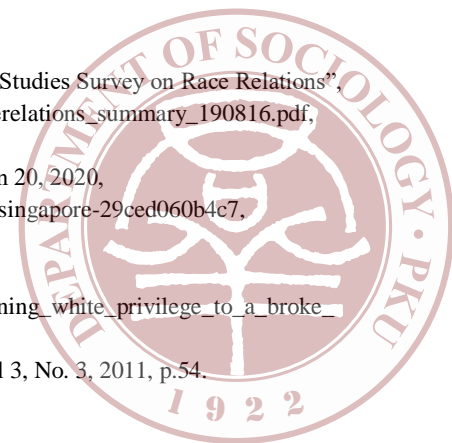
“华人特权”这一词本身就具有极大误导性，因为它在强调种族和谐和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格格不入，容易引起主体族群的反弹。因此，帮助华裔族群正确理解“华人特权”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明白，这种“华人特权”纯粹就是数量多数优势所赋予的客观特权而不是受到任何有待或优惠的结果。这更有助于帮助他们体会少数族群的处境，并重新审视他们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注意到自己的隐形优势之后，作为主体族群的他们应该更加顾及少数族群的感受，在言行举止中拿捏好分寸，不要在开已经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群体的玩笑（punch-down）。坚持“华人特权”是因为华族文化优越感盛行，坚持新加坡政策上存在偏向某个族群的不实指责不仅无助于增进种族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增加族群之间的猜忌和隔阂，新加坡离种族和谐相处的目标愈来愈远。

¹ Mathew Mathews, “Key Findings from the Channel NewsAsia –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urvey on Race Relations”, Aug. 2019,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cna-ips-survey-on-racerelations_summary_190816.pdf, 2020-12-27.

² Donovan Choy, “The Dangerous Influence of “Chinese Privilege” in Singapore”, Jun 20, 2020, <https://donovanchoy.medium.com/the-dangerous-influence-of-chinese-privilege-in-singapore-29ced060b4c7>, 2020-12-24.

³ Gina Crosley Corcoran, “Explaining White Privilege to a Broke White Person”, https://medschool.duke.edu/sites/medschool.duke.edu/files/field/attachments/explaining_white_privilege_to_a_broke_white_person.pdf, 2020-12-29.

⁴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Vol 3, No. 3, 2011, p.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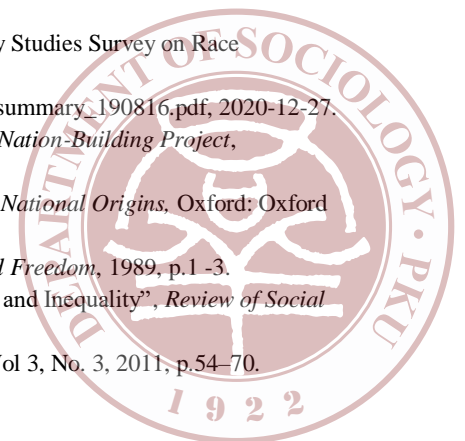


五、结语

“华人特权”在一个曾经经历种族暴乱、强调任人唯贤制度和种族平等的国家中是异常敏感的词汇。正确认识“华人特权”而非逃避才是进步性的，才是走向构建种族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事实上，“华人特权”并非是说法律上赋予的权力，或是华人优越感文化促成的结构，它仅仅是华人占据多数所拥有的优势，而身为华裔难以察觉这些优势。因此，当只有认识到这些隐蔽但却客观存在的事实后，才能体恤到新加坡少数族群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压力，进而调整华裔的思想和心态，避免下一个“褐脸”的情况重演，为未来和谐的种族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Adeline Koh, “Chinese Privilege,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ity in Singapor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deline Koh and Sangeetha Thanapal”, March 4, 2015, <http://www.boundary2.org/2015/03/chinese-privilege-gender-and-intersectionality-insingapore-a-conversation-between-adeline-koh-and-sangeetha-thanapal/>, 2020-12-30.
2. Alfian Sa’at, 31 July, 2019, <https://www.facebook.com/alfiansaat/posts/10156608389667371>, 2020-12-30.
3. Chang Yau Hoon, “Revisiting the Asian V 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Argument used by Asian Political Leaders and its Validity”,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32, No.2, 2004, p.154–174.
4. Donovan Choy, “The Dangerous Influence of “Chinese Privilege” in Singapore”, Jun 20, 2020, <https://donovanchoy.medium.com/the-dangerous-influence-of-chinese-privilege-in-singapore-29ced060b4c7>, 2020-12-24.
5. Eng Fong Pa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Malay Muslims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 No.2, 1981, pp.148 – 161.
6.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2003, p. 766.
7. Eugene K.B. Tan,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2003, pp. 751-774.
8. Eugene Teng, “Majority race must be wary of false sense of entitlement”, December, 2016,
9. Gina Crosley Corcoran, “Explaining White Privilege to a Broke White Person”, https://medschool.duke.edu/sites/medschool.duke.edu/files/field/attachments/explaining_white_privilege_to_a_broke_white_person.pdf, 2020-12-29.
10.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Policy Changes to support an inclusive and cohesive home”,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20100312010/press_releasesc_spr-eip-spr_q.pdf, 2020-12-30.
11.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td_majority-race-must-be-wary-of-falsesense-of-entitle_011216-pdf.pdf?sfvrsn=77739f0b_0, 2020-12-30.
12. Humairah Zainal & Walid Jumblatt Abdullah, “Chinese privilege i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13. Lee Siew Peng, “When did race become an issue here?”, Oct 4, 201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forum/letters-in-print/when-did-race-become-an-issue-here>, 2020-12-28.
14. Lily Kong, Brenda S.A. Yeo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Ritual and Spectacle: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Day Parades in Singapor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6, No.3, 1997, pp. 213–239.
15. Maisy Wong, “Estimating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ethnic quotas in Singapore using housing transac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15, 2014, pp. 131 – 145.
16. Mathew Mathews, “Key Findings from the Channel NewsAsia –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urvey on Race Relations”, Aug, 2019,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cnaips-survey-on-race-relations_summary_190816.pdf, 2020-12-27.
17. Michael d. Barr, Zlatko Skrbiš, *Constructing Singapore Elitism, Ethnicity and the Nation-Building Project*,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
18.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 Peggy McIntosh, “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Peace and Freedom*, 1989, p.1–3.
20. R. Quinn Moore, “Multiracialism and Meritocracy: Singapore’s Approach to Race and Inequalit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8, No.3, 2000, pp. 339–360.
21.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Vol 3, No. 3, 2011, p.54–70.



22. Singapore's ruling elites", *Asian Ethnicity*, 2019, pp. 1- 17.
23. The Straits Times, "Slight increase in racial minorities perceiv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IPS-OnePeople.sg survey", Jul 30, 201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lightincrease-in-racial-minorities-perceiving-workplace-discrimination-ips-survey>, 2020-12-30.
24. Today Online, "Parties behind 'brownface' Nets ad given stern reminder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acial sensitivities: IMDA", August 14, 2019,
<https://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parties-behind-brownface-nets-ad-given-sternreminder-paying-attention-racial>, 2020-12-30.
25. 周娟:《多元同化刍议》, <https://www.sinoss.net/qikan/uploadfile/2010/1130/501.pdf>, 2020年12月30日。
26. 陈冬霞:《新加坡与韩国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启示》, 2004年8月29日,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9>, 2020年12月28日。

【网络文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中华民族认同¹

邓立光（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中华民族悠远庞大的知识体系

方块字在距今 6000 年以前就已经产生，到了 4000 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基本定型，而且发展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及至秦代，完成了字形的统一。汉字是单字单音，由此形成单字单音的语文体系。我国各地方言很多，虽然如此，语文结构仍是单字单音，只是声母韵母有些差异，这就是全国语文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内涵。以清代康熙皇帝整理《四库全书》为例，分经、史、子、集，共 44 类，3503 种，内里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鉴略、制度、地理、天文、哲学、宗教、科学、医学、技术、体育、文学、艺术等共 79337 卷，36304 册，就是用当时的通用文字写成的。这让我们不能不从认识一种人类文明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它。正如不懂英语，就很难进入现代西方庞大的知识体系；不懂德语，很难进入启蒙运动以后的欧陆哲学与法学的领域。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知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几乎就与人类这个庞大悠久的文明体系无缘。这是历史事实。

二、中华文化“理一分殊”，无强迫同化的传统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崇尚符合人性并不断涵养人性向善的伦理体系。如儒家的孔孟之道，其理想就是追求平实的人类善良本性的共同向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礼臣忠，用理性来安顿人类的竞争，用礼乐来陶冶性情的文明。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追求吗？难道先哲孔子只是汉人的吗？不，他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纵然民俗不同、服装不同、口音不同，然而都会有一个如斯向上升华的向度。在统一的文化精神之中，保持着各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与侧重点，在文化精神上是共同性，在表现形式上是多元性，这就是宋明理学中所说的“理一分殊”。

中国人很早就从哲学上体会到“理一分殊”“多元一体”的道理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中国则中国之”，从来都是“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是政治

¹ 人民政协网<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0-09-21/doc-iivhuipp5473763.shtml>（2021-3-11）

融合，也是文化融合。大家自愿融入中华文化，这是数千年来各少数民族汇聚成中华民族的特征。汉唐时代，在其境内生活的外族安居乐业，慢慢主动融入了文化主体之中。宋代商业贸易大盛，生活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入乡随俗，主动融入，中国也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如海绵般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而不失去自己，正是海纳百川，汇为江海。

三、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主动融入中华文化

在中华民族有史可载的几千年里，不断有强大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中央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正统。石勒、苻坚等自称“中国皇帝”。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换服易姓，以通用语代替鲜卑语，还追尊孔子为“文圣尼父”。这些都是当时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措施。北魏其后分裂为东西魏，西魏权臣宇文泰还重用汉人苏绰、卢辩等依据《周礼》制定新官制。

通用语文包含的广博知识体系、中华文化的“理一分殊”，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武力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文化上依然主动积极融入中华文化。韩愈《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是后天培养起来的，无论哪个民族，接受中华文化，都可成为中国之人。

蒙古族曾在中原建立元朝，当时以蒙古无可匹敌的力量，在其管治下的国土，大可一律遵行蒙古原来的制度及文化。但回看历史，元朝虽然把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文化教育上却因循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所考的竟然是中原传统经典，要读四书五经，要用通用语书写。事实上，在元朝成立以前，元太宗窝阔台就听从了契丹族儒生耶律楚材的意见，开科取士。元仁宗时正式推行科举。元武宗海山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孔子的尊崇甚至超越了唐、宋两代。元武宗海山则说，“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制度和制度，恰恰反映了博大的胸襟和长远的眼光。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理性、知性和包容，融入其中恰恰可以壮大自己。比如在政治权力的继承上，是打斗得天下好呢，还是顺位继承好？选拔精英是看家族门第好呢，还是公开考试好？这都是客观真理，关系到少数民族自身的繁衍与发展。这正是少数民族先祖们的伟大之处。

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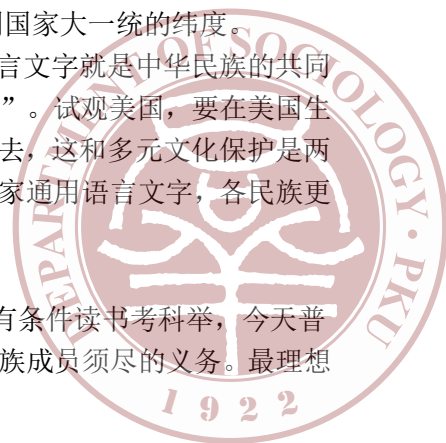
清代沿用明朝政制，即采用开国重臣汉人范文程的建议，开科取士。教育方式和读本对文化传承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元或清，统治者都要求用中华传统的、通行的教育方式和读本。清朝统治中国 268 年，完全认同中华文化。康熙时期除了编纂《四库全书》，还整理了一部《康熙字典》，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清代蒙古族和满族统治者努力学习、融入中华文化体系，除了文化本身的理由还有政治理由，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过往常有一个说法，认为满族开科取士是为了笼络汉人，这是一种狭隘的分析。在大一统的国度里，统治者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考虑。国家的完整、和谐与团结是最高国家利益，也是最高人民利益。何种语言文字有利于国家的完整、和谐与团结，统治者便用该种语言文字。这是一种公心，为政以公，是对自我的超越，上升到国家大一统的纬度。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须有共同沟通的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是中华民族的第一语言，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公民身份的“母语”。试观美国，要在美国生活发展，必须懂英语，要留学美国必须经过托福考试，英语过关才能去，这和多元文化保护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且并不矛盾。今天，国家倡导各民族公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更应全面广泛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享国家强大带来的繁荣和乐。

五、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责任

国家教育适用于全国 56 个民族。古代教育不普及，只有少数人有条件读书考科举，今天普及教育，所有学生都能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也是作为中华民族成员须尽的义务。最理想



的图景是，每一个国民尽他的义务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中华民族政通人和；各民族也学好本民族的基本历史文化及语言，传承传统文化。前者是国家的责任和个人的义务，后者主要尊重个人的意愿和自我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正是根据这样一种理想图景制定，很早就把中华文化“理一分殊”“一体多元”的道理实践到治理上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既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也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多年来，国家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致力提升各族人民生活，在政治上、教育上、工作机会上都给予特别帮扶，未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根据儿童教育心理学，孩童学习语文的年纪越早越容易掌握所学的语言文字，并且越早越能掌握多种语言文字。教育实践证明，在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同时学国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并不减低学习效果，都有“母语”的学习效果。相反，儿童9岁以后，语言学习能力会逐渐趋于一般，新学的语言都可能变成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若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中华民族之内决不可以被视为第二语，它必须是公民的母语。因此应该从幼儿园、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起，最好能达成“学前学好普通话”，建立起扎实的语言感觉，使孩子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受益终生；同时也建立起扎实的心理认同，在孩子幼小的心中即牢牢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324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